

知知港华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ETTLEMENTS IN TITI

彭晓桃

PANG SHIAU TAU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Y 2017

知知港华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ETTLEMENTS IN TITI

By

彭晓桃

PANG SHIAU TAU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中文）学位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May 2017

ABSTRACT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ETTLEMENTS IN TITI

Pang Shiau Tau

The first chapter focused on describing the methods of research in this thesis, which including the timing of research scope, study motivation, research review,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main historical.

The reason of a village which name “Titi”, but also called “Siow” will be described. The contributor of village Siow, such as Siow Kong Jie, Ming Fung, Bing Jiao, Cheng Tao, Lianfu, Chen Tian Cai, Zhu Wen Xing, Yap Fong also been written. Besides that, this dissertation also be com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Siow companies, as well as the church.

Village Titi a little-known settlement before explored, soon become a famous Chinese community gradually. The reason of development in Titi will be mentioned. In addition, many historical relics lost, but still can restore the real history from the rest of the historical traces. Thus,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Titi will be discussed from 1838. In the British colonial period, the reason of residents who stay at Titi will be analyzed. During the occupation of Japanese, the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t Titi before independence will be discussed too.

After independence of Malaysia. The main reason of residents in Titi move out from the village, and the reason of Titi become a popular tourist landscape will be stated. Finally, contribution of Siow's and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in Titi also be declared in this dissertation.

摘要

知知港华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

彭晓桃

此文首章重在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架构。当中包括了研究范围与时限、研究动机、研究回顾、主要史料介绍、研究方法等。

本文将从知知港何时被发掘，以及为何以“知知”二字命名，尔后又为何被称为萧家村为始。研究将带出萧氏及一些开埠功臣，即萧官姐、鸣凤、炳娇、成滔、连福、陈天财、朱文兴、叶房等人对知知港的繁华所付出的贡献。其中，本文还囊括了萧氏经营的公司，以及教会成立的缘由。

知知港从一个鲜为人知的聚落，逐渐成为一个著名的华人聚居地，其过程是如何？此外，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历史遗物佚失，仅能从其余的历史痕迹处还原知知港的历史，而英殖民时期确实曾摘入些许有关历史资料。本文除了剖析知知港居民在英殖民时期留在知知港的主因，还叙述日据时期知知港居民的处境，以及二战后，英政府如何收拾日军撤退后所留下的残局。

致谢

在撰写论文期间，笔者的确遇到许多瓶颈与困难。所幸得遇一位良师与众多贵人，才让笔者得以解决种种难题。

首先，衷心感谢论文指导老师——张晓威老师的悉心指导。非常感谢老师在笔者撰写论文期间所给予的引导、协助、鼓励与包容。此外，感谢老师不断提供独到的见解，犹如一盏明灯，引导笔者研究的方向。正因老师慷慨地借出书本，论文才得以如期完成。笔者自问才疏学浅，从确立论文范畴至完成论文，皆归功于张老师的指点与启发。若无良师倾囊与费时指点，本文将难以面世。

另外，感谢众多学者与知知港居民的协助。在笔者撰写论文期间，曾因不知从何下手进行研究而沮丧万分，他们都适时地给予动力和支持，使笔者重燃希望，继续撰写论文。其中助力最甚者莫过于周厚荣先生。在此郑重感谢之。

最后，感谢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家人。感谢家人的体谅，让我在学习的路上无后顾之忧。对于各位的指导与支持，笔者当铭记在心。谢谢！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知知港华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为彭晓桃亲自撰写，乃取得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之要件。

此证：

（张晓威副教授）

副教授兼院长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拉曼大学

日期：_____

中文系
拉曼大学

日期：30. 05. 2017

硕士论文提交

此证彭晓桃（学号：10ULM07243）在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张晓威副教授指导之下，经已完成此题为知知港华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彭晓桃）

宣誓

本人彭晓桃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我也郑重声明，此论文未曾或同时提交给拉曼大学或其他机构作为学术论文。

(彭晓桃)

日期：30-5-2017

目录

	页码
摘要·····	ii
致谢·····	iv
论文核实书·····	v
硕士学位论文提交·····	vi
宣誓·····	vii
目录·····	v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知知港与萧家村的形成	
第一节 知知港的形成·····	8
第二节 萧家村的形成·····	9
第三节 萧氏掌控的华人社会·····	13
第四节 知知港其他开埠者·····	22
第三章 二战前及日据时期知知港的发展	
第一节 二战前的发展（1860-1942）·····	25
第二节 日本南侵占领马来亚（1942-1945年）·····	31
第四章 二战后至独立前知知港的发展（1945-1957）	
第一节 战后英殖民政府的重新执政·····	40
第二节 英殖民政府面对的难题——垦耕者与共产主义者·····	44
第三节 英殖民政府解决知知港难题的方式·····	51
第五章 结论·····	63
参考书目·····	68
附录·····	72

第一章 绪论

“聚落”的意思是村落，人民聚居的地方（刘竹风等，2000：5014）。聚落不仅是房屋的集合体，还包括与居住地直接相关的其它生活设施和生产设施。聚落是人类活动的中心（赵荣、王恩涌、张小林，2006：191，198）。聚落的形成与发展演变是受自然、经济、社会、历史诸条件作用的结果。聚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密切，受河流、地貌的影响尤其显著，而人文因素在聚落发展中的作用是关键。“发展”的意思就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或变化的趋势（刘竹风等，2000：4961）。

知知港（Titi）是目前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有名的华人村落。然而，许多想了解知知港历史的民众常感困惑，因记载它的历史资料是那么的缺乏，加上政府没有设立专业部门去立法记载或搜集，重视保护和开发历史文物的行动（周厚荣，2010：13），因此，1982年，萧桂芬为了保存知知港的遗产开始为此地撰写了一本英文史书 *Chinese Society In Rural Malaysia : A Lo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iti, Jelebu*（以下称萧著）。书中的历史是从1838年始至1960年终。二十余年后，为了便于民众，周厚荣执笔写了一本名为《知知港开埠史料回忆录》的华文书籍（以下称周著）。相对于萧著，周著较通俗与容易让不谙英语的华人拜读的。本研究将以两者为根基进行研究，厘清知知港的历史背景，以期带出萧氏家族在知知港的贡献，希望能为从事相关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

第一节 研究范围与时限

知知港的面积有 30 平方公里，四面环山，在马来西亚中部。它坐落于森美兰州的东北部，距离芙蓉约 48 公里。知知港群山环抱，中间下陷，形成一个盆形，居民盘居山脚盆地，村中有条川流，名唤金龙河。¹

知知港资源丰富，锡矿产量多，吸引了许多海外劳工前来谋生。后来，萧官姐着力发展事业，招募乡亲前来工作，知知港逐渐繁华。因此，知知港属于自然形成的聚落。尔后，英国政府为了防止村民接济共产党，于是将居民圈禁起来，形成集中营式的新村。由此可见，知知港是从“自然发生的村落”转为“计划设定的村落”。1957 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知知港的村民方恢复自由。本研究将叙述知知港自 1838 年至 1957 年在马来亚的发展。²

第二节 研究动机

知知港如今是一个偏僻的小镇。一个人才外流，一些基本设施如街灯、电话亭、公园等仍有待提升和设置的地方（Siow Kong Choon, Chin Ka Chin, 2010: 29）。在外人的眼中，它是落伍的，设施不健全的地方。可是，它即见证了萧氏家族的移民

¹ 据悉当年英国人采矿时，发现该河含有金沙，故取名为金龙河（刘崇汉：1984：29）。

² 马来亚在 1963 年 9 月 16 日与新加坡、砂拉越与英属北婆罗洲组成马来西亚。新加坡与 1965 年 8 月 9 日脱离马来西亚独立，虽然使马来西亚的政治区域稍微缩小，但马来西亚的名称并不因为新加坡的独立而有所更改，而且也一直沿用至今。（萧新煌，2000：483）

史，也是一个少有被大部分同一姓氏华人选居的地方。萧桂麟在撰写有关知知港的历史时，仅在书中提到了萧氏祖先初到知知港的奋斗史，反将叶房、张盘运、陈天财等开埠华裔先贤的贡献搁在一旁。由此可见，萧氏在知知港的重要性。可是，萧氏曾做过什么，在知知港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之处。

华人在知知港的踪迹，始于 1838 年的开埠，至今已有百余年。在这百余年里，知知港研究及保护工作尚未被重视，因此研究成果较显著的似乎仅萧桂麟 (Laurence K. L. Siaw) 的 *Chinese Society In Rural Malaysia : A Lo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iti, Jelebu* 和周厚荣的《知知港开埠史料回忆录》。本论文的研究意义是希望为知知港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让有兴趣者借镜与参考。

第三节 研究回顾

周厚荣所执笔的《知知港开埠史料回忆录》和萧桂麟撰写的 *Chinese Society In Rural Malaysia : A Lo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iti, Jelebu* 是众多史书中较多着墨在知知港的书籍。周厚荣在《知知港开埠史料回忆录》中是以轻描带过的方法带出知知港的历史，如在写知知港华人“移民动机”时，仅以一页一两段概括一切：第一段写东南亚与中国的联系；第二段才写当时华人被“卖猪仔”、逃避新政或被马来西亚丰富的天然资源所吸引而来。可是，事实真的如其所说，这些都是让他们愿意离乡背井、宁愿抛弃家属而不辞劳苦地来到马来西亚的主因吗？似乎王赓武在《中国与海外华人》中对华人移居的原因剖析得更为清晰。王赓武将华裔移民者分成四类而论，即华商、华侨和华裔或再移民型，其中亦详述了移民者移居至马来西亚的过程、年份等，甚是精辟，但不是全都适用于介绍知知港华人，因《中国与海外华

人》不止记录了移民者进入马来西亚的情况，亦顺带书写移民者在欧美洲的情形（王赓武，1994：6-14）。

萧桂芬撰写的 *Chinese Society In Rural Malaysia : A Lo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iti, Jelebu* 是一本至今对知知港论述得比较详细的书籍。曾在知知港发生过的大小事情，无论是政治、教育、战争、设施等都以年份划分出来，以让读者能细读之。这本书告诉了读者知知港旧时的面貌，此中的“萧姓家族”和“英国人干预前的矿业发展”都有助于笔者的论述。笔者将延续萧桂芬对萧姓家族的描绘，即除写萧家开山鼻祖萧官姐在知知港的贡献外，还会着墨于引述知知港发展成萧家村的源头。笔者会以萧家村为楔子，然后逐渐呈现知知港的历史背景与其现代的面貌。

除了上述两者，刘崇汉、萧妙云、陈松青和陈嵩杰皆莅临知知港进行学术研究。刘崇汉是位致力于研究华人奋斗史的学者。他擅长在论述锡矿史和客家根源。他曾为知知港群英华小撰写〈知知港客家村历史沧桑〉。该文可在《知知港群英华小百年校庆纪念特刊》（2011）处寻获。萧妙云是知知港史料协会主席。为了让后辈了解知知港的历史，萧妙云收集了不少有关知知港的剪报和书籍。鉴于萧妙云的名望，知知港群英华小筹委有幸得到他亲笔为《知知港群英华小百年校庆纪念特刊》撰写的散文——〈知知港今昔谈〉（页 28-36）。内里笼统介绍了知知港发展至今的经过。森美兰中华大会堂为了帮日治时代蒙难的华人申冤，动员访问当时的幸存者，然后出版了《日治时期森州华族蒙难史料》（1988）。里面着重口述历史，是马来半岛各州中，记述日军暴行最详尽的史料。陈嵩杰的《森州华人史话》（2003）也囊括了些许知知港的历史。同时，书中也记载了不少为森州作出贡献的先贤。

第四节 主要史料介绍

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官方报告如 *Annual Report of Jelebu*（日叻务年度报告）以及 *Population Census No. 7 State Negeri Sembilan*（森美兰人口统计），萧著与周著亦是本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Annual Report of Jelebu*里阐述了官方如何处理民生事务，有时还可从中得知他们的工作检讨细看森美兰人口统计，便能得知研究区（知知港）某年的人口数目有助于研究的佐证。森美兰人口统计不仅统计某年份居民的人数，还记载着从事某工作的人数。这对于要了解当地人口的职业很有帮助。

第五节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如下：

（一）文献分析

有关研究的资料大可从两方面着手：一、就地取材；二、学者手中得取。能够寻得资料的地方不外乎图书馆、当地的史料中心、档案局、森州大会堂、《星洲日报》报馆等地。若有需要，亦可跨州觅之。认真整理所搜集的资料，以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

有关的资料文献包括：

- (1) 历史地图。该类地图应当含有显示村落的每个方位，便于得知知港的旧时面貌，然后与现时的环境对照。知港外的建筑物标志都对研究知港发展提供依据及揣摩点。
- (2) 新旧村志。此类资料比较难得，更多是口述历史，虽多有存疑之处，但仍有助于发掘新资料。

上述资料文献收集后，便得进行分析，以从旁推敲出事情的真相，再翻查历史悠久的学校校刊，或向当地的资深长者请教，以补文献上的资料不足。

（二）田野调查法

此研究法注重实地考察，除了勘查知港的地理位置与资源为村民带来的益处，亦能透过寻访长者还原历史真相。进行田野调查法时，笔者发觉大部分旧时的特点已面目全非。当地村民的叙述和实地考察可作为本研究的佐证。旧址的景色与一些涉及的人物已被摄录以作佐证及参考。

此外，年老一辈的村民与相关学者将是访问的主要对象。

第六节 章节架构

第一章为**绪论**。此章重在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架构，包括了研究范围与时限、研究动机、研究回顾、主要史料介绍、研究方法等。

第二章为**知知港与萧家村的形成**。文内包含知知港何时被发掘，以及为何以“知知”二字命名，尔后又为何被称为萧家村。此章的研究将带出萧氏及一些开埠功臣，即萧官姐、鸣凤、炳娇、成滔、连福、陈天财、朱文兴、叶房等人对知知港的繁华所付出的贡献。其中，本文还囊括了萧氏经营的公司，以及教会成立的缘由。

第三章是**二战前及日据时期知知港的发展**。知知港从一个鲜为人知的聚落，逐渐成为著名的华人聚居地，其过程是如何？此外，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历史遗物佚失，仅能从其余的历史痕迹处还原知知港的历史，而英殖民时期确实曾摘入些许有关历史资料。由此，本章有关知知港的发展将由 1860 年起论述，除了剖析知知港居民在英殖民时期留在知知港的主因，以及叙述日据时期知知港居民的处境。

第四章为**二战后至独立前知知港的发展**。此章将论述知知港在二战后至马来亚独立前的发展。从中便可得悉日军撤离后，英政府如何收拾战后所留下的残局，以及知知港成为一个著名聚落的过程。

第五章为**结论**，概括整篇研究的心得，对知知港华人聚落的形式与发展作一综合评述，提出个人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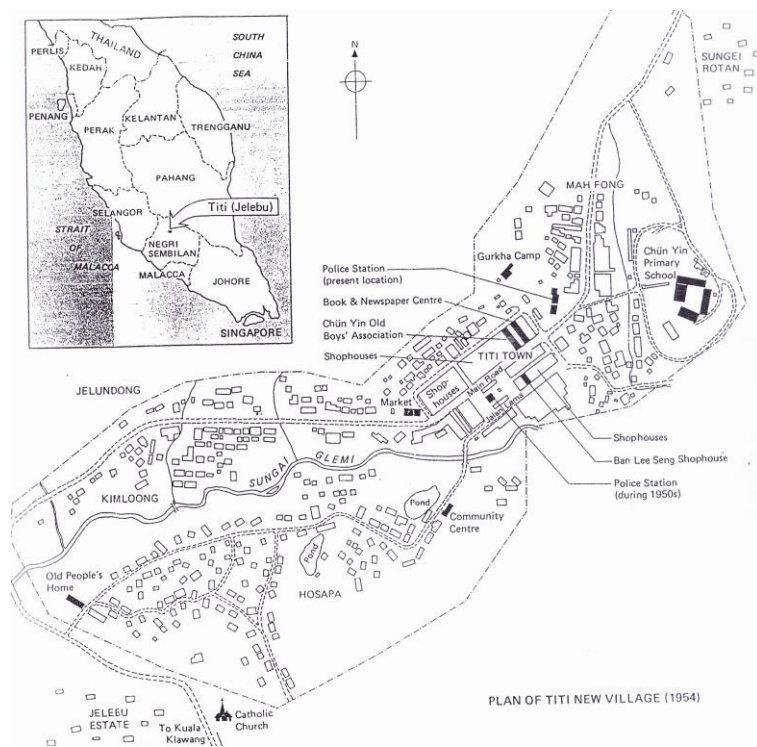
第二章 知知港与萧家村的形成

第一节 知知港的形成

知知港是一个奇特的村落。原本已被取名为“知知港”的它，似乎像人一样拥有别称，那就是“萧家村”。

虽然“知知港”名为“港”，但实际上却不像外人想象中接进海域的地方。³知知港被四个港围绕着。它们是新港、横港、金龙港和市区港。新港是运输锡矿的铁船停泊的地方；金龙港位于金龙区山上；市区港位于市区后面；横港坐落在警局旁边。⁴知知港的面积只有 30 平方公里，地处马来西亚半岛中部的丘陵地带，距离吉隆坡约 100 公里。

图 1：知知港地理位置图



资料来源 (Laurence K.L. Siaw, 1983: 无页码)

³ “港”是名词，如香港、福隆港，就是有水，有河的地方。受访者：周厚荣，2017年3月18日，强中贸易

⁴ 受访者：周厚荣，2017年3月18日，强中贸易

据查知知 (Titi⁵) 巫文之意，乃小桥、木桥，“而此地乃一小河川的盆地，故居民普遍称之‘港’。”（周厚荣：2010：6）

知知港坐落于森美兰州的东北部；东临彭亨金马扬 (Kemayan)，南接柔佛峇都安南 (Batu Anam)，西涉森美兰芙蓉 (Seremban)，北濒雪兰莪乌鲁冷岳 (Hulu Langat)。距离芙蓉约 48 公里。知知港群山环抱，中间下陷，形成一个盆形，居民盘居山脚盆地，村中有条川流，名唤金龙河。气候方面，终年秋高气爽，素有雾镇或黄梨乡之美誉。知知港大约于公元 1838 年开埠。最初的华族移民，系由彭亨河乘竹筏经过榴莲知贝 (Durian Tipus) 河，转入布拉隆 (Peradong) 三岔河口上岸，散居在双溪罗丹 (Sungai Rotan) 沿岸一带，日后逐渐增加 (刘崇汉：1984：29)。

第二节 萧家村的形成

知知港目前隶属于森美兰州 (Negeri Sembilan) 的日叻务县 (Jelebu)。它仅是日叻务县中的一个小镇。

在 1957 年，知知港华人的人口已超越百分之九十六，直到 1970 年华人在知知港的人口依然多过其他种族约占百分之九十九。虽然知知港华人在 2010 年时已大幅度减少，但是他们仍然是知知港的主要居民。因此，华人在知知港长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⁵ 原文，jambatan kecil (daripada papan, batang kelapa) (树干、木板等搭的) 小桥，独木桥 (钟松发、黎煜才，2013：1754)

表（一）：知知港人口统计表（1957、1970 & 2010）

知知港的人口数目					
年份	巫裔	华裔	印裔	其他	总数
1957	81	3, 023	29	2	3, 135
1970	47	4, 621	0	0	4, 668
2010	52	1, 709	32	7	1, 800

资料来源整理自 State Negeri Sembilan (1957:7), State Negeri Sembilan (1970:11) 和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2010:67)。

知知港，又称萧家村。知知港之所以成为华人口中的萧家村是基于以下原因：

一，知知港大部分的居民都是祖籍广东惠州龙岗坪地县四方埔村⁶的萧氏族人

大批华人移入知知港的历史渊源要追溯到 1892 年左右。当时，祖籍广东惠州龙岗坪地县四方埔村的萧官姐⁷从家乡来到马来亚谋生，与萧谭、萧风，鸣凤三位宗亲在知知港开采锡矿。随后，他在现今的森美兰芙蓉买下了大片的土地。后来，萧官姐动员坪地乡亲到马来亚谋生，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坪地乡亲聚居在那里。（我是知知港人，年份不详）

⁶ 据周厚荣口述，萧氏族人来自惠阳县。受访者：周厚荣，2017 年 3 月 18 日，强中贸易。

⁷ 萧官姐的事迹将在后面的相关章节作详细讨论。

由于萧官姐是来自广州惠州的客家人，因此从家乡去到知知港落脚的宗亲或友人大都是客家人，以至在 1980 年代的时候知知港萧氏族人尚占有全村人口总数之百分之七十五的比例，造成知知港素有萧家村或客家村之称（刘崇汉：1984：31）。

至今，知知港仍有许多萧官姐以及其宗亲的后裔，据说皆源于祖籍广东惠州龙岗坪地县四方埔村。⁸

图 2：知知港住户在门上挂着萧氏的堂号——兰陵



拍照日期：2016 年 7 月 30 日

⁸ 作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知知港村民大都在门口上挂上萧氏的堂号——“兰陵”（见图 2）。

二，知知港的开埠祖师是萧姓人

周厚荣曾在《知知港开埠史料回忆录》里写道“谁是开埠鼻祖？余立彬之父～余子郎”，他曾怀疑开埠鼻祖是余子郎，但在书中又写道“第一位落脚知知港开埠华裔先贤却是一个谜？”从此句可知，谁是知知港的开埠鼻祖，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周厚荣都不敢断言。然而，周厚荣在书中始终将萧姓的开埠功臣——萧永安放在第一位，只因他的出生年份是 1852 年，比余子郎早 6 年（周厚荣，2010：16）。这种写法有可能是暗喻着知知港的开埠鼻祖是萧永安。虽然周厚荣不确定知知港的开埠鼻祖是萧姓人，但是周厚荣在介绍开埠功臣时着墨最多的人正是萧官姐。这同等周厚荣对萧官姐的认可。

无论是周厚荣抑或萧桂彝，两人都不能确定第一批参与知知港开埠的劳工姓甚名谁，他们的存在完全没有历史纪录（周厚荣：2015：2）。因此，萧桂彝在撰写论文时是根据手上的史料，即以 1870 年为知知港之始，可是并不否认在 1870 年前也许存在着一批开埠功臣，却苦无史料佐证。因此，萧著并未将 1870 年前的功臣纳入其书中。于是，萧著将萧官姐誉为开埠鼻祖。萧桂彝不仅以萧官姐此人作为知知港的灵魂人物，还顺带列出其在该处所立的功绩作为佐证。

无论是周厚荣还是萧桂彝，两者的著作都对萧氏的贡献给予肯定。

三，源于萧氏族人为知知港不遗余力地付出的缘故

如上所述，萧官姐是为知知港引进许多居民的主事者。他为知知港的天主教徒提供土地、交通、工作机会等，无一不是造福人民。若非萧官姐热心地提供住宿与就业的机会，远自中国的广东坪地民众，就不会不辞劳苦地远渡重洋来到知知港谋生。尔后，同样祖籍广东坪地的萧鸣凤、萧炳娇、萧谭等亦致力于解决民生事宜。直至今日的知知港，萧氏宗亲仍努力不懈地为知知港争取福利，如萧进平、萧妙云等。

第三节 萧氏掌控的华人社会

在 1901 至 1930 年间，根据萧桂彝在 *Chinese Society In Rural Malaysia : A Lo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iti, Jelebu* 中的记载，每个人之间所发生的争执均由家中长者摆平；家庭纠纷由邻里安抚。若面对棘手又牵涉到贸易的问题，将面对仲裁，而这个时候，萧官姐将会挺身而出。尔后，萧炳娇和他的伙伴（万利成公司）成为社会领袖帮忙解决社会纠纷。至于当地的警察或英殖民政府甚少被邀请去摆平纷争。由此可见，萧官姐及万利生公司权利与地位之尊，两者在该地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一、萧官姐的崛起

图 3：萧官姐的照片



照片摄自《星洲日报》（2014年7月14日：1）

萧官姐，天主教徒，圣名约瑟，1864年出生，1929年逝世。萧官姐常被坊间唤为萧观姐。经过采访，发觉大部分曲解萧官姐原名者皆因人云亦云，而萧桂彝曾在其专著中称呼他为“Siow Kon Chia”，多位学者包括周厚荣、刘崇汉等均有参考，相信他们将英文名字直接翻译为中文，以致后来“官”与“观”字的误差。约2010年，一群天主教徒到皇家山坟场清除杂草时，无意中发现萧氏家族之坟墓，继而从石碑中得知一些历史资料，发见“Siow Kon Chia”墓碑上的名字为萧瑞口⁹，而非萧官姐，原以为该墓非萧官姐所有，可是与萧瑞口同葬在该处的却是萧官姐的亲友，加上墓碑上的英文名 Siow Kon Chia 和圣名与萧官姐符合，以此作合理的推断，那就是萧官姐的墓碑。然而，为何萧官姐的墓碑上不用萧官姐，反而是萧瑞口三字？经查访，也许年代久远，许多知港居民皆无法提供相关资讯。¹⁰

⁹ 因墓碑上的字迹模糊，以口代之。

¹⁰ 不过按周厚荣的说法，他认为口就是岐，那是萧官姐的故乡地名。对此说法，笔者有所保留，因查询相关资讯，并未发现有瑞岐这地方。

既然萧官姐的真实姓名众说纷纭，而“萧官姐”三字又常出现在学者的书中，如《知知港开埠史料回忆录》及《客家总会十周年纪念特刊》等，笔者就暂且概以萧官姐之名来撰述其事迹。

图 4：萧官姐墓碑



照片摘自周厚荣（2010：24）

1893年，两所欧洲的采矿公司停止营业。本来对华人而言，这是个大好时机。他们能够接手采矿公司，从中牟利。可是，由于太多华人所经营的公司资金并非十分充足，小公司间的主事者又无意合并经营，加上知知港所在的位置荒芜，惯于享逸的他们更不愿冒险接手（Laurence K. L. Siaw, 1983: 21）。众多华商的却步，给了萧官姐一个大好的良机。

1892年，萧官姐被“卖猪仔”至马六甲。猪仔的身价一般是100美元，须替雇主做数年工才能还清身价，但有不少其实是通过掳拐、拐骗的方式诱骗到来的，可谓是一种贩卖人口的行为（林廷辉、宋婉莹，2000: 2）。在马六甲工作两年后，便迁移至双溪乌绒（Sungai Ujong）。在那，他认识了传教士——罗门·卡特利（Roman Catholic）。罗门请萧官姐在教堂（Paul Street）里工作。经过罗门襄助，萧官姐得以解决生活所需，尔后更建设铁罐买卖企业。由于与传教士接触甚久，在了解该教教义后，遂改为信奉天主教（J. M. Gullick, 2003: 122）。

过后，Paul Street教堂的神父带萧官姐到日叻务。在那，他申请一块锡矿地。不久后，他得到政府批准在知知港经营采矿的生意。虽然生意不多，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萧官姐毅然决定从他的家乡招募员工。当时在广东的宗亲仍然生活在饥饿与贫困之间。他想到广东招募员工的新闻传出，无数宗亲热烈回应。¹¹

萧官姐不仅资助他的宗亲，甚至是该些宗亲的家人来到知知港。随后，许多萧氏族逐渐认识在那的传教士，也有许多宗亲自愿成为天主教徒。除了编排大量来自同乡的宗亲的工作岗位，萧官姐也不忘向教堂寻求资金的帮助，以便他能拥有充足的资

¹¹ 受访者：周厚荣，2011年11月11日，强中贸易

金再添加采矿所需的设备。由于萧官姐所聘请的员工都是源自于同一村落，大家都是同乡，若遇繁杂公务，妇孺们都会不计回报地在旁协助。同乡们并肩合作使萧官姐的事业得以扩张，相对的，更多的中国广东坪地居民移民至知知港谋生（Laurence K. L. Siaw, 1983: 23）。¹²

知知港锡矿业发展得最蓬勃的时期是 19 世纪末。锡矿业的主要员工是华人。锡矿业得以发展的因素包括在 1883 年解决了与华人工人的沟通问题，以及政府在 1888 年建造了一条小车道以从芙蓉通往瓜拉格拉旺（Kuala Klawang）¹³。（J.M Gullick, 2003: 89）。

萧官姐发财置业后，除了照料同乡子弟，仍不忘提携与帮助他的恩人和教会。他不仅资助森美兰天主教的活动经费，还拨出两英亩土地给予教会。（Laurence K. L. Siaw, 1983: 23）虽然萧官姐很想让宗亲子弟像他般加入天主教，可是当时排外情绪高涨，他们大都不愿加入（J.M Gullick, 2003: 122）。

锡价在 1985 年 10 月 24 日开始滑落（徐俊华, 2016: 12），矿石逐渐减产，正巧英政府在大力推广种植橡胶树的行业，萧官姐毅然决定种植橡胶树。为了防止同宗员工因采矿业的景气而出走，萧官姐将五英亩土地拨给每一位帮他种植蔬果与橡胶树的同乡。当同乡得知将来得以享有这五英亩土地之余，加上遇上经济不振及蒙受亏损时又能得到萧官姐的襄助，都乐得接受提议。（Laurence K. L. Siaw, 1983: 23）

¹² 受访者：周厚荣，2011 年 11 月 11 日，强中贸易。

¹³ 瓜拉格拉旺是一个位于森美兰日叻务的小镇。

萧官姐策划的种植业带来了萧氏宗亲新希望，萧氏宗亲将所有的收成交给萧官姐脱售，然后得利。他们所栽种的水果——香蕉、凤梨等都得到街坊的大力追捧。在短期间，他们都逐一致富，萧官姐则成为日叻务华人最大的经济支柱。为了便于销售大量的蔬果，他经营商店，附带售卖家庭用品。橡胶业方面，萧氏宗亲仅需半天的时间照料与收割橡胶，剩余的半天则用在赚外快，很快的，萧氏宗亲逐渐成为日叻务一带的富族（Laurence K.L.Siaw, 1983: 21-24; 周厚荣, 2010: 21-22）。

二、万利成公司（BAN LEE SENG BUSINESS ENTERPRISE）的成立

萧氏宗亲尚未迁移至知知港前，知知港已涌入许多中国大陆南方的华人，以致知知港出现文化各异，在语言方面，大都以福建话、广东话和海南话为主的现象，直到萧氏宗亲大量定居，才开始转变（Laurence K.L.Siaw, 1983: 27-30）。

1920年，许多萧氏宗亲搬移至萧官姐处，但没信奉天主教。他们的行为影响了当地的人民。当萧氏宗亲中的一些人与当地人联婚后，让客家文化融合在生活习俗当中。最显著的影响就是知知港的居民都以客家话为主要沟通语言。如今生活在日叻务的华人在说话时总是参杂两种方言，有异于原本的方言。萧氏宗亲中有六人的业绩是最为显著的。除了萧官姐，还包括了萧鸣凤、萧炳娇、萧成滔、萧连福和萧安。他们皆生于中国广东。他们经由萧官姐的赞助与帮忙才能从乡下移至日叻务，并在萧官姐处打工。虽然只是低下的文员，但他们仍善用所赚取的分毫投资（Laurence K.L.Siaw, 1983: 27-30; 周厚荣, 2010: 48）。

1920年，萧鸣凤等人从萧官姐建立的天主教堂迁移至知知港以赚取更浓厚的利润。每人以一百元作为资金创建了万利成公司。他们在主要的街道（位于老街门牌二号）租了一间店屋售卖粮食，以及工作和生活必需品。他们从萧官姐身上学会以赊账的方法得到货源，减少了开店的成本。尔后，他们汇兑款项、投资矿业和种植树胶，成绩斐然（萧妙云，1984：31）。

三、教会的成立

萧官姐是天主教徒，他在事业上的成功使他对天主更虔诚，然而不是每一位得到萧官姐帮助的萧氏宗亲愿意信奉天主。虽然萧官姐并没有强迫同宗们信奉天主，但仍想为天主招徕更多的信徒。他多次宣扬教义、举办慈善活动，许多人都有参与萧官姐所举办的活动，但信徒仍未能突破五百人（Laurence K.L.Siaw, 1983：24）。这也许是当时中国的排外风气所致。¹⁴

鉴于萧氏家族不热衷于投入教会的活动，萧官姐唯有另辟捷径，宣布凡是加入天主教的宗亲，将得到一块地、橡胶树和资助金。1909年至1910年间，日叻务的天主教

¹⁴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通过勒索赔款和提供政治贷款，控制了中国政府的财政金融，使中国社会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现象更加严重，清政府也把战争军费和赔款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民众活得苦不堪言，因而多有排外的心理（邓力群，1996：60-72）。萧氏宗亲皆来自中国，他们因政治迫害而远渡重洋来马来亚谋生，所以也在这排外的氛围下，不愿接受西方宗教。

徒从原本的 100 人增长到 310 人 (Laurence K. L. Siaw, 1983: 25; 周厚荣, 2010: 21-22)。¹⁵

即使受洗进教的萧氏宗亲并不多, 萧官姐仍然极力于为大众谋福利, 如建设更宽敞的天主教堂、传教士的住所、坟场。过了不久, 萧官姐在教堂的右边建立了一座学校。外来的传教士或职余老师则专注于教导萧氏宗亲。课程仅限于圣经里的故事、天主教的教义, 以及一些基础的华文知识。由于宗亲们都忙于开拓事业, 乐于参与的人仍然不多, 加上缺乏适当的指导和正确的指示, 教堂的活动常涉及经济、社交活动。萧官姐只好暂作“神父”的职务, 也因曾解决一些有关英政府与民众的纷争而得到尊敬, 更被册封为“甲必丹”以解决当地的华人事务 (Laurence K. L. Siaw, 1983: 26; 周厚荣, 2010: 21-22)。¹⁶

经过教堂, 在日叻务的华人, 尤其是萧氏宗亲得以与欧洲人接触, 更从中学到许多西方的新知识。传教士与外乡的教友间的接触, 知知港的华人得以摄取多方面的知识, 以及得到各国工艺产品以增强农作物的生产率, 并扩展事业 (Laurence K. L. Siaw, 1983: 26; 周厚荣, 2010: 21-22)。¹⁷

许多萧氏家族成为天主教徒后, 并没有真正地领会及履行教义。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 传教士逗留时期极短无法持续传授教义、许多村民仍然趋向保持原有的宗教信仰、天主教徒常被授予西方科技的知识而缺乏教义的传授。大部分萧氏宗亲是为了保障自己而入教, 但是他们仍然进行传统的祭祀活动。由于天主教的教义规定教徒不许

¹⁵ 受访者: 萧妙云, 2012 年 6 月 3 日, 萧妙云住家。

¹⁶ 受访者: 萧妙云, 2012 年 6 月 3 日, 萧妙云住家。

¹⁷ 受访者: 萧妙云, 2012 年 6 月 3 日, 萧妙云住家。

崇拜或祭拜其他天神，若某祭祀活动得不到萧官姐的首肯，村民们得闭门进行。即使此事被揭发，教众都展示采纳与默许的态度（Laurence K.L.Siaw, 1983: 27; 周厚荣, 2010: 21-22）。¹⁸

在 1920 年，萧官姐原想吸纳更多教徒的计划失败了，于是他决定提供更好的福利予教徒，即将部分田地和橡胶树园赠送给那些刚信奉天主教的教徒。那时仅有 20 户家庭愿意更换信仰而已。他非常失望，并闭门不见客数天。

尔后，萧官姐自觉年老，而自己在芙蓉又有生意，由于无法兼顾庞大的事业，便陆陆续续变卖产业给萧鸣凤、萧鹏友、萧记煌等人，然后搬至芙蓉。¹⁹萧官姐在那建立圣保罗中学，为少年提供教育，并在芙蓉度过余生。萧官姐于 1929 年 5 月 24 日（65 岁）逝世，与其妻子同葬（Laurence K.L.Siaw, 1983: 27; 周厚荣, 2010: 21-22）。

¹⁸ 受访者：萧妙云，2012 年 6 月 3 日，萧妙云住家。

¹⁹ 受访者：周厚荣，2017 年 3 月 28 日，强中贸易。

第四节 知知港其他开埠者

除了萧氏，尚有许多曾为知知港的发迹做出贡献的人。他们包括了陈天财、朱文兴、叶房等。他们的名声与贡献虽不及萧氏，但不可抹杀他们的功劳，以下是针对他们的事迹加以论述。

一、陈天财

陈天财生于 1865 年 10 月 22 日，卒于 1899 年 5 月 11 日，广东番禺人，早年在中国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由于国内时势动乱，受英政府聘请为廉价劳工到知知港。当时的知知港以马车为主要的交通工具，20 岁左右，陈天财便从事运输行业，饲养马匹为生。不久，他因精明能干，而被英政府的器重，成为当地的侨领，常为当地华人充当中间人与政府接触或为他们解决生活难题（周厚荣，2010：19）。

其长子陈庆桐尔后在瓜拉格拉旺（Kuala Klawang）开办事务所，为当地华人办理一切土地买卖，胶园店屋等交割事务，备受村民爱戴。它是百年老庙广福宫创办人之一，也是 1911 年开办群英学校先贤之一（周厚荣，2010：19）。

二、朱文兴

朱文兴（1860-1934）广东丰顺人，年少时因中国国内动乱社会而被卖猪仔来到檳城之后南下来到知知港。由于其人忠厚老实、勤奋节俭，深受英国官员器重，在英人胶园任工头。不久，他将辛苦储蓄到的蓄钱投资及从事锡矿、胶园、种植业等，闯出一片新天地。有了名誉地位，朱文兴除了在平日里关照同乡的福利外，亦非常关心民族教育。他积极向英政府争取开办群英小学，并于 1911 年成功争取，正式开课，同时受其他同乡一致推举，出任第一届董事长，到 1926 年才退休（周厚荣，2010：26）。

三、叶房

2015 年 4 月 20 日，《星洲日报·花城》曾刊登有关知知港其中一个开埠功臣的事迹：

叶房应该是介于 1827 至 1838 年之间出生。16 岁时，因家乡内乱，以致民不聊生，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来到马来亚任矿工。在那个年代，数以千计的中国华侨矿工，沿着彭亨河和直凉河进入森州的日叻务。英国人和一批鸦片商，也带来 800 名本地马来人与华侨矿工开采锡矿，而叶房是其中一人。日叻务在那个年代一片荒凉，属于原始森林，一行人在双勾罗丹（Sungai Rotan）开采锡矿，这一带藏锡丰富，因而有不少人迅速致富。根据历史记载，叶房很可能追随当年的甲必丹盛明利、甲必

丹叶亚来、甲必丹邓三伯和甲必丹黄三伯（有可能是叶房的岳父，甲必丹黄甲）。

由此可见，身为海陆丰籍的叶房²⁰和萧官姐一样都是因时事逼人，不得已下，才离乡背井。一个 16 岁的年轻人，独自一人在异乡，难有一番作为。不过，他非常幸运，被当年出任英政府行政指挥官和甲必丹的黄甲看中，并欣赏其才华、魄力与勤奋，因而纳为己用，并招为乘龙快婿，叶房从此扶摇直上（周厚荣，2015：2）。

叶房是知知港开埠先贤之一，可是其身份竟然得花数十年才被发掘，似乎不如陈天财、朱文兴等人早已享誉多年。恐怕其由离不开叶房的岳父——甲必丹黄甲²¹。据报道，大部分资产均为叶房岳父家所拥有，相信他在知知港的成就全归功于黄甲。叶房因得到岳父的资助，才能在知知港创业。由于叶房致力于采锡，甚少参与社会福利活动，久而久之，其名被村民与社会逐渐淡忘。

²⁰ 据马来西亚海陆会馆署理会长叶玟豪提供的讯息，叶房的籍贯实为海陆丰。受访者：叶玟豪，2017 年 3 月 28 日，强中贸易。

²¹ 黄甲又名黄三伯。1871 年，黄三伯与盛大安、丘国安、邓佑伯等甲必丹创立森美兰惠州会馆。受访者：周厚荣，2017 年 3 月 28 日，强中贸易。

第三章 二战前及日据时期知知港的发展

1860年因芙蓉双溪乌绒（Sungai Ujong）境内二位酋长争夺地盘而发生战斗²²，当时许多南来的华族矿工都云集在卢骨（Lukut）及亚沙（Rasah）工作，因受时局影响，纷纷由芙蓉班底（Pantai）路绕汾水凹山腰骑大象去日叻务县探测锡苗，寻求矿业发展。经过一番探测后，发觉知知港境内蕴藏着丰富的锡苗，于是人们相约结伴前来居住，采用最原始的人工方法采锡，即利用天然河道之水割沙沟，淘洗锡米（萧妙云：1984：30）。

知知港的开发，继而吸引了英国人和日本人前来发展。

第一节 二战前的发展（1860-1942）

在英军入侵前，开采锡矿的工作都是由马来人包办，而华人原是由马来贵族聘请来开采锡矿的工人。之后，马来贵族允许华人和欧洲人前来开采锡矿。英国人为了展示自己的地位，以及解决国人对物质上的需求，他们必须开拓土地。而马来亚恰好是大英帝国需求大量锡矿的生产地。刚巧马来亚地点适中，便于英人与别国经商或换取急需品，加上马来亚当时的政局动荡，英人顺势插手马来亚事务（Masriah binti Mispari 等，2014：19，28，133）。

²² 随着锡矿业的蓬勃发展，割据一方的土酋的财富欲望也愈来愈炽烈。1860年，Dato' Kelana Syed Abdul Rahman 和 Dato' Bandar Kulop Tunggal 因欲抢夺华人锡矿区锡米的抽税权和保护费，而爆发大规模的战事（陈嵩杰，2003：51）

在1872年，Dato' Kelana Syed Abdul Rahman 继任为芙蓉双溪乌绒的首长。当时，另一个同样有影响力的酋长，即 Dato' Syahbandar Abdullah Tunggal 正威胁着 Dato' Kelana Syed Abdul Rahman 的地位。两者皆想占据宁宜河²³ (Sungai Linggi)，把锡产垄断，独揽暴利。然而，Dato' Syahbandar Abdullah Tunggal 深得大臣与采锡者的拥戴。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Dato' Kelana Syed Abdul Rahman 在1874年4月21日与英方签署协议，英方得支持 Dato' Kelana Syed Abdul Rahman，而 Dato' Kelana Syed Abdul Rahman 则需将 Sempang 到 Permatang Pasir 的管辖地交给英方。根据当地既有的协定，Dato' Kelana Syed Abdul Rahman 得先征求 Dato' Syahbandar Abdullah Tunggal 的同意才能做任何重大决定，所以 Dato' Syahbandar Abdullah Tunggal 拒绝承认双方的协议。(Norazit Selat, 1990:21-25)

Dato' Kelana Syed Abdul Rahman 写信告诉英方，Dato' Syahbandar Abdullah Tunggal 已得到马默王 (Raja Mahmud)、马迪王 (Raja Mahdi) 和华人的支持，他的行为将危害双溪乌绒和马六甲的英国商人。于是，英方与 Dato' Syahbandar Abdullah Tunggal 接触。英方更带了一队警察劝 Dato' Syahbandar Abdullah Tunggal 同意英方与 Dato' Kelana Syed Abdul Rahman 在1874年签署的协议。Dato' Syahbandar Abdullah Tunggal 仅辩解自己无意与 Dato' Kelana Syed Abdul Rahman 对抗，只是觉得自己的权利被剥夺而受辱。但是，他仍然拒绝在协议中签名认同，并将加马央 (Kemayang) 的城墙加固和得到马默王 (Raja Mahmud²⁴) 的支持。过后，Dato' Syahbandar Abdullah Tunggal 委任同族的亲戚为新的 Dato' Syahbandar —— 拿督阿玛 (Dato' Syahbandar Ahmad Bukit)。Dato' Kelana Syed Abdul Rahman

²³ 宁宜河不仅是锡米的运输河道，也是与外界联系的通路。由于它地处要津，所以途经之处，地方土酋都设有关卡征抽锡税 (陈嵩杰, 2003: 39)

²⁴ 马默王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将军 (Panglima Perang)

向 Dato' Syahbandar Abdullah Tunggal 开战。Dato' Syahbandar Abdullah Tunggal 最终被放逐至新加坡。尔后，英方逐渐收服林茂（Rembau）、日叻务（Jelebu）等地，并将它们归纳入森美兰。自此，英方正式成为森美兰的掌权者（陈嵩杰，2003：39-53；Norazit Selat, 1990:25-32）。

英人进驻马来亚后，一切事务如常，仅派任代表管理各地事宜与开办了警察局，以及要求各地缴税。（Masriah binti Mispari 等，2014：133）。

1926 年，由于市场的需求，锡矿的价值达到高峰——一吨市值\$2,414。1931 年，经济萧条，锡矿逐渐贬值至\$1,020 一吨。这种情况致使投资者撤资，最糟糕者还得面临破产的危机。刚巧因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粮食短缺的问题逐渐倍受重视。为了解决生计上的问题，英政府遂鼓励民众种植。眼见食粮的价格日益飙升，知知港民众便顺从政府的号召（Masriah binti Mispari 等，2014：19、28），转向耕种。然而，橡胶业不如预期中的蓬勃发展，只有少部分的资本家如萧官姐对此行业有兴趣。原因是橡胶树须七年左右才能带来利润，对那些想快速致富的投资商而言，这是浪费时间及非常冒险的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知知港约 10,000 人失业，许多人变卖产业。经过英政府大力推行耕种业和饲养业，知知港民众又眼看食品价格高企，颇有发展空间，便开始种植（凤梨、香蕉）以自给或售卖，以及从家乡运进牲口（Laurence K.L.Siaw, 1983：37、38）。

20 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盛行生产摩托车，导致橡胶的价格持续上升。于是，经过外资的帮助下，橡胶被大量栽植。1920 年左右，马来亚供应了百分之五十三的橡胶，是全世界橡胶产量最多的国家（Masriah binti Mispari 等，2014：131）。从

1902 年至 1921 年期间，森美兰州的橡胶种植地从原有的 3,000 英亩增加到 279,420 英亩 (J.M Gullick, 2003: 111)。

橡胶业之所以能蓬勃发展，全赖于下列原因：

一、咖啡价降低²⁵，橡胶价涨，为了牟利，园主转去种橡胶；二、欧洲和美国市场急需大量的橡胶生产货品；三、许多劳动力从印度来开垦栽植地，解决劳动力的不足；四、英政府以廉价的税收鼓励园主栽植橡胶树，即收取少许的田地税和出口税；五、许多欧洲国家的大企业家愿意投资橡胶业；六、H.N.Ridley 介绍如何割胶，以增加产量。

1929 年发生华尔街股灾，伴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从 1925 年的顶峰走下坡，一连串的事件和因素促成了全球持久的大萧条。持续 5 年左右的大萧条影响了橡胶业，橡胶价也因此暴跌。在 1929 至 1932 年间的大衰退，又称“经济大恐慌”。此现象致使银行关闭、工厂倒闭，以及失业率高居不下。（王曾才，1991：319）

战后时期，粮食短缺，加上知港民众不喜爱马来友族所耕种的稻米，他们认为那是次货，而且不能长久摆放，于是许多农民便托亲友从中国运进许多稻米、蔬菜、水果，然后广泛种植，所有的成果都在当地或临近的城市兜售。经过不断地尝试，许多新颖的耕种法便由此诞生。技巧成熟让他们萌生另一种赚钱的门路，那就是饲养牲

²⁵ 由于机动车辆的需求量增加，刚巧面临咖啡市价偏低以及咖啡树叶感染疾病的商人只好转投橡胶业，以牟利。（J.M Gullick , 2003: 110）

口。他们又托亲友从中国运进猪、鸭、火鸡等。由于知知港的华人越来越多，需求量亦日益攀升（Laurence K.L.Siaw, 1983: 39）。

欲种植，水源是不可或缺的。没了水源，根本无法灌溉。当时许多靠近水源的土地都被列为马来人的保留地，均被开发来耕种，华人只好沿用之前筛洗锡矿的方法耕种，即制造喷式技巧灌溉，接着利用水车从高处运水至低处。有了此种方法，再加上当时粮食短缺，许多民众都以耕种为业。结果一传十，十传百，知知港到处都遍布农民。土地开发急速的原因导致政府不愿再批地让一些民众耕种，那就延伸出许多非法之徒在保留地占地私自栽植。这些非法之徒又被称为垦耕者。垦耕者一词，是指那些拥有暂时性准证、非法或未经批准而利用公共或私人土地的耕种者

（Sandhu, 1964:157-183）。为了杜绝这类事情发生，政府部门派出了警察捉拿违法者，可是常常不得而返。当局后来便加重刑罚，凡是被抓的违法占地者都倍受虐打，人民极痛恨警察，反政府意识由此诞生。他们偶尔更群而袭击警员（Laurence K.L.Siaw, 1983: 39-40）。

在 1911 年前，知知港并未有正式的学校，有些想让孩子学习的大户之家都是由外请进教师进屋教学。至于其他平民则组织一小团接受一些曾学过基本华文知识的教师传授知识。²⁶

当时，英殖民地政府对华社的教育活动一向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过也不干涉华社开办学校。直到 1919 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²⁷之后，英殖民地政府恐怕马来半岛的

²⁶ 受访者：萧妙云，2012 年 6 月 3 日，萧妙云住家。

华校师生会受到当时中国反殖民地政治思潮的改革派影响，而进行颠覆活动，便在 1920 年颁布学校注册法令，实行关闭那些没有遵守政府订下的课程、管理方式及不符合卫生条件的学校。1920 年注册法令抗议者，将被驱逐出境。当时的教育总监温思德（R. O. Winstedt）还规定只有用方言教学的华校才有资格领取政府的津贴及提供师资和课本。1925 年英殖民地政府在学校注册法令条款，再加一项修正案，赋予教育总监权力取消参与颠覆活动的教师的注册，并禁止采用含有反英政府内容的教科书。从 1925 年至 1928 年之间，估计最少有 315 间华校因违反学校注册法令而被关闭。（莫顺生，2000：17-18）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后，学校教科书大量采用白话文，同时，以华语取代方言为华校教学媒介语，而导致课程重新编订。及后，又数度变更；新加坡马来亚的办学者皆以中国马首是瞻，也一时感到无所适从，造成各间学校都不能拥有共同的统一课程表。新加坡福建公会在 1929 年和 1931 年为其开办的学校重新编订小学课程表便是当年其中一个惯见的例子。（莫顺生，2000：21）

²⁷ 1919 年 5 月 4 日，中国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屈辱政策。由此引起一连串的罢课、罢市、罢工及其他事件，终于造成整个社会的变动和思想界的革命。（周策纵，2000：1）

第二节 日本南侵占领马来亚（1942-1945年）

1931年，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东亚的美梦，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继而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1939年武汉战役后，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必须设法截断中国从南方获得外援的途径，以及掠取东南亚丰富的自然资源，用来维持其对华的长期战争。马来半岛的橡胶和锡的产量是重要的战略物资。1941年12月8日，南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举入侵马来亚。（司马乔，1992：1-3）

1942年2月15日起至1945年9月12日，日本占据了马来亚。由于英军当时全神贯注于欧洲战事，而在马来亚的英军缺乏军事训练和军备，日军仅用了十个星期就击败了英军，占领马来亚（Ramlah binti Adam等，2014：3、4、12、13）。英军撤离马来亚时，是采取“摧毁”的策略，即毁掉桥梁、铁路、马路、田地以及采矿场（Ramlah binti Adam等，201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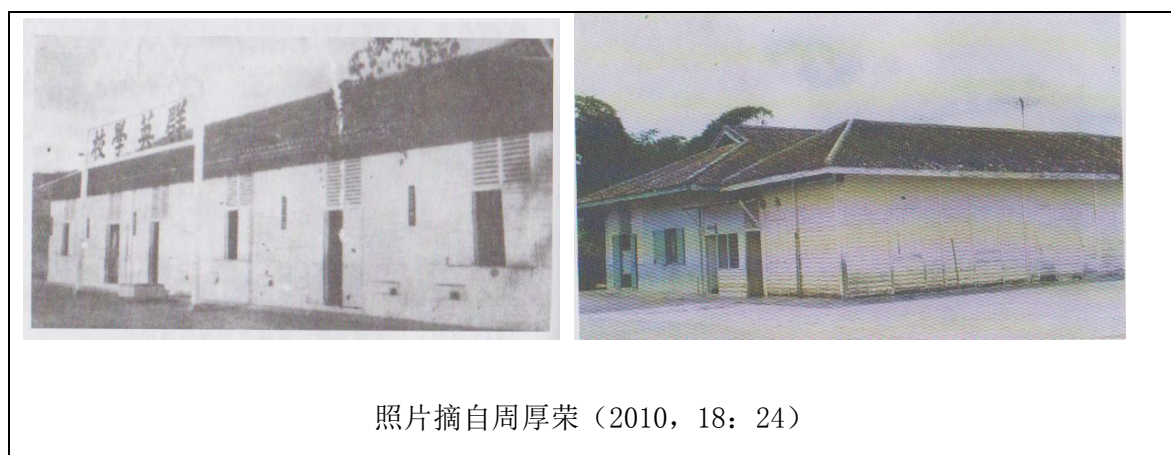
一、日本发动战争初期

自中国“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人民投入抗日救国的反侵略的战争后，而身在马来半岛的知知港的华侨也和全马爱国华侨一样，痛恨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滔天罪行，在马共知知港党组织的推动下，先后组织了“南侨筹赈祖国难民分会”和“抗敌后援会”，为唤起广大同胞敌忾同仇的爱国热情，走上街头和农村，演剧、卖花，宣传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捐献金钱、财物，寄回祖国，支援抗战，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新马侨友会编，1992：176）。

日本进驻马来亚时，采取善待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政策以得到支持，一同对抗英军，因此众多马来领袖被委任要职，那是英军占领马来亚时不曾发生的事（Ramlah binti Adam 等，2014：31）；相对的，日军并无意思要善待华人。这是因为马来亚的华人和其他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一直都支持中国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其中包括 1915 年的抵制日本货，1919 年的抗日运动等（林廷辉、宋婉莹，2000：4）。

日本人占领知知港时，在一座小山的顶峰起了座警察局。警局面对知知港城市区，周围被高达三尺的墙壁围绕着。六尊大炮面向城市，似乎在告诫居民千万别轻举妄动或试图推翻他们，因为他们随时可以摧毁一切。警察们常与隶属于日军的搜山小队交集以搜出反日人士。当日军发现反日人士便会立即杀掉，并将他们的尸首带到市集展示，以便起到警戒之效（Laurence K.L.Siaw, 1983：57、58）。

图 5：日军撤退后的群英学校



说明：群英学校的前身就是警察局，墙上洞口就是置放大炮的地方。

此外，日军还在主要通道设定哨岗，还派了哨兵在那儿驻守。凡是欲通过此道的人都必须向他们鞠躬，包括那些骑自行车和电单车的人士，他们得从交通工具上下来，然后恭敬地鞠躬。有些哨兵的态度是极度恶劣的，一旦不满意对方的鞠躬，哨兵将会惩罚他们在烈日下罚站，有些不幸者则会被掌刮和乱踢。²⁸

每当日兵沿户查探时发现有漂亮的女孩，都会对她们施暴。虽然日军的上司早已下令不可如此，但大部分日军都阳奉阴违（Laurence K.L.Siaw, 1983: 38）。为了保护家族的尊严，有些女婴会被他们的亲生母亲扼杀于摇篮中。至于那些尚未成年的少女则匆匆嫁为人妇，免得招致日军的魔掌。日军的暴行还延伸至商家身上。日军为了便于监测知知港的商家，他们都派了间谍和侦探在商家身边。商家们为了免除麻烦，都会缴上贿品或贿金（Laurence K.L.Siaw, 1983: 38）。

无可否认的，尚有些顽固派，不肯贿赂那些间谍和侦探。他们不久就会被召去警察局查问。为了显示自我的办事效率，警察们经常都会召见这些商家。有些商家常暗地里帮助反日游击队。当被察觉，帮助游击队的人都会迎来牢狱之灾与严刑拷问。对待这些“滋事分子”，日军是施以各种酷刑的，如将他们浸在水中、痛打至骨折或强行拔掉指甲等（Laurence K.L.Siaw, 1983: 57-59）。

对于日军的恶劣招呼，当地人又怕又恨，有者因此成为游击队，设法破坏日军的行动。在马共森美兰州地委的指示下，知知港组织把原来的抗敌后援会改为抗日同盟会，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号召和组织知知港各阶层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打击日本侵略军；另一方面，召集当地党、团员和有志抗日青年，组成

²⁸ 受访者：萧妙云，2012年6月3日，萧妙云住家

了抗日游击队，迅速转入山区，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新马侨友会编，1992：176）。于是，日军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合作断绝游击队的粮食，迁徙居民，让居民集中在一个地方，控制每一户人家的粮食，免得居民接济游击队。

1942年，粮食短缺，日军垄断了耕种的行业，鼓励民众种植容易生长的木薯。此外，锡矿业在当时也面对了难题，那就是勘探锡矿的人员均面对反日人士及日军或警察的刁难，甚至面临生命的威胁，加上那时的日本倍受外界的杯葛²⁹（Ramlah binti Adam等，2014：33），欧洲商人到处寻找锡矿产地时又常遭掠夺，锡矿业在日本时期并不如英殖民时蓬勃。同时，橡胶业亦因存在的战争风险而受影响。仅有农林业是被当时的政要大力支持。当时，日本人对华人的仇视及残害，一些华人被迫迁移分布到偏僻的森林或沼地边缘。环境所逼，垦耕者逐渐增加（Laurence K.L.Siaw，1983：60）。

在日本人占领马来亚时期（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5日），垦耕者人数增加了接近三倍（林廷辉、宋婉莹，2000：3）。由于稻米的生产力不高，当地华人并不感兴趣，他们反而钟情于耕种木薯、番薯、香蕉和蔬菜等回报率迅速的食品。日本人对当地华人如何进行农林业的心思感到不满。同时，他们也忽视早期英政府曾承诺将一些地区划分为马来保留地的政策。他们认为所有的土地应归日本，而有关部门可以授予任何人使用任何一块土地，并在有必要时收回。结果在占领期间，森林砍伐的事情频传，造成大量的水土流进河流和稻田，导致淤积（Laurence K.L.Siaw，1983：60）。

²⁹ 日军与联军开战时，锡矿和橡胶不能运去西方，而白米不能从泰国和缅甸运进来。四周的海域都被联军的军艇监控着，以致物资都不能运回日本。同时，贪污私藏物品、印刷假钞四处可见，导致钞票过剩，物资短缺的情况，更引起通货膨胀（Ramlah binti Adam等，2014：33）

二、知知港大屠杀

日据初期，日军不准村民耕种、种稻，知知港村民经常挨饿，因为营养不足，医药缺乏，大部分人都患上肚涨、脚胫生疮、脸青眼凸的怪症。虽然经过维持会与日本政府交涉后稍有缓解，得到稀粥充饥，但随后的苦日子只有更甚（翁清玉主编，1988：35）。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马来亚时，随意草菅人命。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惨剧之一，发生在1942年3月18日。日军进驻日叻务和知知港后，侦悉知知港华侨以往的爱国行动和支援当前抗日武装斗争，于是在知知港余朗朗华人村进行治安肃清，以致爆发日本大屠杀事件。“一批为数上百名的日军，手持荷枪实弹和尖刀包抄整个村落，大概二百多户房屋，将一千四百七十余的手无寸铁男女老幼村民，集体屠杀，一夜之间，血流成河，尸体横满遍地。”（林博史，1989：14）事后，日军为了毁尸灭迹，纵火焚村，把全村夷为平地（萧妙云，1984：32；新马侨友会编，1992：177；林博史，1989：14）。

根据《森美兰抗日游击战争回忆录》中的陈述，当天几百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军来到知知港时，对当地的居民说“皇军”要检查“安居证”，命令群众全都到益群学校集合。群众中大部分村民都心感存疑、害怕，因为当时的“安居证”是贴在门口的，一望而知，何必多此一举地再度检验。此时，“洛生（投靠日本人的村民）从半芭村回来，大声叫喊乡亲们不用怕，说日本兵上午在半芭村检查完就没有事了。”（单汝洪，1999：32）村民不知真假，信以为真，陆陆续续地在益群学校聚集，日军在益群

学校故意拖延时间，一直等到下午，便把年轻妇女赶进学校宿舍关起来，然后把年轻男子绑起来，赶进附近的屋子里。下午四时左右，日军开始进行大规模屠杀，他们先用刀把青年男子一个个刺死，接着进学校宿舍强奸妇女，然后将她们刺死，而婴儿则丢进水中活活淹死（萧妙云，1984：32）。

经此一役，知知港中幸存的村民绝大部分逃离该地，以致知知港的贸易活动停滞不前，陷于瘫痪。

据传有日军杀人魔王之称的蓝田上尉（萧妙云，1984：32），主张继续在知知港村庄插“红旗”，标志再次进行屠杀，所幸当时任职于古打灵医院的印裔助理医生甘明姆都及日叻务县侨领林邦谦局绅和当地一些侨领，向日叻务县日本驻军军官横少路少尉请命，希望他向上级蓝田上尉叙说民意。日本军队结果在得到各侨领保证居民均遵守日军法令和合作后，才阻止了蓝田上尉再次展开大屠杀的野心（萧妙云，1984：32）。

三、日军败走与共产主义者的崛起

1945年，联军欲强制日军无条件投降，可是被拒。于是，联军分别在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在广岛和长崎投下核弹（王曾才，1992：86）。最后，日本才答应无条件投降（Ramlah binti Adam等，2014：27）。

在知知港，日本投降的消息是被封锁的，直到日军于1945年8月10日，黎明前约上午04时30分撤离。即使街道上熙熙攘攘的，充斥着橡胶工人从各种食品摊位购买早餐的声音，眼看着一行行日军骑着自行车离开，他们仍不晓得发生什么事。由上午6时30分，商铺陆续开门，开始一天的生意。店主、商人、妇女和生活在城镇的孩子开始出现在大街小巷，他们大多走向主路两旁的小吃摊上买早餐。在这个特别的早晨，人民发现主要道路两端的岗哨已空置（Laurence K.L.Siaw, 1983：72）。

日本投降后，游击队出现在知知港，并迈向山坡上的日本堡垒。他们都拿着机枪或步枪。确保日本真的离开后，这些游击队很快就走下去乡镇，并立刻走进了几家日本雇用的侦探处。那些侦探被拖出后便被游击队砍死。（Laurence K.L.Siaw, 1983：73）

在日本占领期间，不能燃放爆竹的。当宣布日本军撤退后，民众从不同的地方取出爆竹并燃放。知知港的居民，尤其是华人，都松了一口气，愉快地度过数天（Laurence K.L.Siaw, 1983：73）。

同时，游击队也接管了知知港并计划在此建立“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Malayan Communist Party, MCP）临时政府”。在决定具体的义务和责任前，马共通过了第一个任务——逮捕叛徒、敌奸归案。凡是身份已公开的叛徒必须被铲除。马共发出公告通知所有居民，如果发现任何可能勾结日本人的叛徒必须向他们报告。大多数曾与日本勾结的人早已逃入丛林。有一些自以为是安全的，并不打算逃跑的人不幸地被逮捕，然后面临“危害群众”的指控。（Laurence K.L.Siaw, 1983: 74; 单汝洪, 1999: 161）

在一个星期内，马共将囚犯从监牢里押出来，由头至脚捆绑在杆上，扔去法庭前的地上，任由一大群人包围，并在那接受“裁判”。公开审判是在嘈杂热闹的气氛中举行。犯人的手脚被反绑在身后，做出了在众人前跪下的举动。心怀怨恨的民众开始冲向被告人并对他们拳打脚踢及吐口水以报复他们当初所犯下的“罪行”。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罪行”（勒索乡亲以及间接导致反对他们的人被收监或被诬告至死）被大声读出，最后才问一个问题：“这个人应该死吗？”人群以高昂悲愤的情绪喊出“该死，该死”（Laurence K.L.Siaw, 1983: 74），他们希望每个囚犯都被处死。毫无疑问的，囚犯们都在人群的掌声与欢呼声中被执行以死刑。

审判和杀害囚犯后，马共开始进行演讲，他们宣布知知港现在是一个“解放区”和马共会照顾居民的利益免受“外人”（意指是英国人，似乎暗喻他们应该返回故乡）的侵害。他们明确地说明所在地——知知港是新的“政府”，由马共接管，不会容忍任何“反对派”。显然，这种共产党至上的演说是针对较为保守的居民。

（Laurence K.L.Siaw, 1983: 75）

在山上的前日本警局和行政大楼，被留在知知港的马共占用为“军事部门”。一百多个从各地慕名而来的青年男女加入了知知港的“军事培训”。他们驻扎在一起，被教导行军、共产主义的歌曲和生存技巧以应付各类的游击战斗。同时，资深的游击队正忙着组织“管理层”并管理不同的“部门”。他们将这些“部门”设在原是书籍和报纸的生产或贩卖中心。他们在大招牌上以红色的中文字写道：“知知港马来亚共产党”，然后竖立在“管理处”的前面。新立的“部门”包括“教育局”，“政治部”，“农业部”，“商务部”和“司法部”。起初，经验老到的商人被要求前往管理这些“部门”，但都因“商业理由”拒绝了。最后，他们大胆放手给中年和年轻人接手管理（Laurence K.L. Siaw, 1983: 75）。

第四章 二战后至独立前知知港的发展（1945-1957）

第一节 战后英殖民政府的重新执政

在知知港的“共产党政府”正想大展拳脚前，英国政府却在此时逐渐回归。1945年10月，新任命的马来民政事务助理专员名为穆罕默·尤索夫（Mohamed Yusof bin Haji Ahmed）在15日抵达瓜拉格拉旺，负责接管英国政府当初的管辖区。穆罕默·尤索夫的任务是协助英国陆军少校和其属下。军事人员的首要任务是解除人民的武装和解散该地区的游击队。日常的行政工作交由“马来民政事务助理专员”和他的属下执行（Laurence K. L. Siaw, 1983: 76）。

在知知港，英国军队来到瓜拉格拉旺的消息引起了广泛的不安。大多数人都对英国人太快回归的新闻感到惊讶。这一则消息也引起了“共产主义政府”官员的困窘和担心。当地所有马共的会员开了个紧急会议。尽管当地马共的会员数字从来没有被公开过，据一些出席了会议的目击者证实，在那里有超过三百人。其中，也许只有200人是会员，其余的仅是支持者。这一个正式的会议，是在前日本堡垒，以及英国人去瓜拉格拉旺后的一天举行。在场者都被要求提出解决方案。许多人都建议在完全移交管治权给英国人前，应全力抵抗。经过多次讨论，他们决定委任一名代表到瓜拉格拉旺去，以尽快和英国人表达他们大多数人的意愿，要求英政府答应将知知港交付予马共作为奖励他们在战争期间抗日的回报。他们答应在知知港的共产党员不会打扰其他地区的民众。（Laurence K. L. Siaw, 1983: 76）

虽有了意见，但没有人愿意会见英国当局，因为他们害怕被列入黑名单。最后，有人提出让李安（音译自 Lee Onn）代表他们发言。在知知港，李安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杂货商。对于成为共产党员的代表，他拒绝了很多次，但他最终屈服了。1945年10月18日上午，他去会见在瓜拉格拉旺的英国官员。他设法得到军政府（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委员会接受他提出的协议，但被断然拒绝。李安试图告诫英国人，共产党在知知港是个拥有完善组织和良好装备的部队，但英国人不为所动。李安无法完成任务。他回来告诉他的朋友，英国人坚持在知知港扩大他们的主权。与此同时，英政府向资深的游击队献议，若他们愿意在官方的表格上签字同意重返平民生活，英方将以300美元作为回酬，并再给予200美元作为弃械投降的报酬（Laurence K.L. Siaw, 1983: 77）。

在李安前往瓜拉格拉旺后的一天，几个军政府的官员搭乘一辆吉普车抵达知知港，并通过扬声器宣布有关共产党员若能弃械投降的酬报价码，请知知港民众与军政府合作，维持当地的法律和秩序。此外，一些军政府的官员在武装部队的护送下来到知知港，并在镇上找几个商人。商人们都很有礼貌地面对官员的询问，但避谈共产党人，避免引起英国当局怀疑或逮捕任何人。同样，当面对那些对英政府存有恶意的人群时，没有人愿意告诉他们任何重要的线索。当整齐的军队抵达知知港，并下令所有居民走出自己的房子。他们被告知需集合在镇中央的空地上，军队们将对他们的房子进行全面搜查。据说，居民们聚集后被问话时，英国军队表现得非常粗鲁。很多被英国军官问话的人都是通过翻译的。（Laurence K.L. Siaw, 1983: 77-78）

尽管缺乏知知港民众的合作和友善的对待，英国军政府还是设法恢复了区域的控制权——至少在表面上控制了知知港。七位马来警察被安置在知知港临时的建筑物处。在主要道路前方，“共产主义政府办事处”的大牌子被拆除。所有共产主义的“官员”纷纷离开知知港，生怕被英国人逮捕（Laurence K. L. Siaw, 1983: 78）。

此外，英国的回归也令两所知知港主要的华文学校再次活跃起来。为了安抚知知港的华人，英国军政府授予财政的援助。得到了军政府的财力协助与民众的支持，以下两所学校得以维持下去。

其中一所得益的学校为 Yak Choy (Catholic) School，即育才学校。它位于南部知知港市镇的教堂旁边。它曾经成为萧氏族人的踊跃出席地。然而，1911 年的中国革命后，左翼政治迅速影响欲送孩子到教会学校升学的家长。若华人家长们坚持送孩童就读教会学校，将被定为“反中国文化”和异类。华人相信一所教会学校将培养青少年反对共产主义。日叻务的军政府曾试图重振学校，但知知港区的华人都不愿送他们的孩子去那里，只有极少数虔诚的天主教徒选择就读此校。经过数年，该校的出席率实在差强人意，学校被迫关闭。（Laurence K. L. Siaw, 1983: 78）

另一所群英学校则发展至今。知知港群英学校的运行模式就像一个企业，非常独特。自从成立以来，都小心应用善心人士捐助的钱财。1911 年，知知港侨领朱文兴、余利彬、林进宝等人为了解决子女向学的问题，向英政府申请开办群英学校。朱文兴捐出二百元作为经费，同时担任群英学校首任总理之职，聘请余俊仙担任校长。刚开始，他们决定雇用两三个教师，学生人数仅有 20 人（萧妙云，2011: 55）。

余校长引退，廖鸿葵受聘为群英学校的新校长。该校便采用中国新白话文讲学，教学制度分班级上课。课本分华文、地理、历史、书信及英文。每周高年级学生需受军操（萧妙云，2011：55）。在1946年，群英学校获得政府资助两份“重建补助金”（1216美元和484.80美元），是有史以来在该地区最多的补助金额。（JeLebu District, 1956:2）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长，扩展学校的需求逐渐逼迫。他们急需公众的捐款，有时一年三到四次。期间，村内热心人士捐款购下隔邻店铺为校舍及门牌75号为校址，并商借横街门牌5号作附设课室上课。鉴于学生人数频频增加，因此地方侨领推荐陈庆彤向英政府申请现今占7英亩的校址建设新校舍。（萧妙云，2011：56）

由于校中一切开销均由董事部筹划，面对资金不足，董事部组织群英铜乐队，拟定规则长期为学校筹款。每逢华人农历新年，铜乐队沿门吹奏，向各商号拜年所得红包全归纳董事部。凡知知港居民娶嫁或丧事聘请乐队前往奏歌，筹得相当款项使用来资助学校建筑三间教室。当时，知知港没有电影戏院设备，于是群英学校都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播放电影筹款（萧妙云，2011：56-57）。

第二节 英殖民政府面对的难题——垦耕者与共产主义者

一、垦耕者

军政府在日叻务所面临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非法占地日趋严重。据说,超过一半地区的华人,即 10,000 人口在国有土地或马来保留地居住或种植农作物,超过 700 亩的土地一直被大部分华人非法占用。³⁰

为了控制和彻底清除垦耕者的问题,军政府采用的第一步骤是派调查小组往各地的乡村找垦耕者。这些小组被告知要向民政事务专员报告每一个被非法占用的准确位置、大小、所种植的农作物种类。小组甚至索取有关该地持有人的名称和地址。这一举动吓坏了不少想非法占地的垦耕者,不敢进一步扩充土地。他们生怕被逮捕。有些庄稼甚至还没有收割,持有人早就远遁他方,免得遇到检察官。因此,调查小组赶到时,大部分垦耕者就此消失在丛林中。其结果是,调查队只能侦查到表面上的证据,即眼前所见的,没有人愿意协助他们。(林廷辉、宋婉莹,2000:5-6)

在调查过程中,华人虽然不肯给予协助,但是军政府并不打算就抑止垦耕者的课题上却步。由于垦耕者不想合作,他们一旦被抓住了,官员就会进行公开执法以作报复。在 1946 年,当局经常设置陷阱和进行突击检查。在面对暴动时,警察便会出面帮助。尤其官员开始被受委屈的垦耕者攻击时,警察就会被征用。当年,共有 55 宗非法

³⁰ 受访者:萧妙云,2012年6月3日,萧妙云住家。

占领的案件被检控，并收到了 2,684 美元的罚款（Laurence K.L.Siaw, 1983: 81）。

基本上，日军投降后，大部分的垦耕者已搬回原地居住或恢复原来的职务。另外一些垦耕者却认为耕种亦能带来盈利（林廷辉、宋婉莹，2000：4），尽管律法严厉，那些华裔垦耕者仍然坚持使用保留地，继续种植农作物。只因他们中有许多人失业，唯有以非法占领这种方法才能维持生计。此外，经过多年在知知港生活，他们皆知道哪个地点比较好，哪个地点可以成功避开调查小组的检测。（Laurence K.L.Siaw, 1983: 81）

在军政府抵制非法占用保留地的同时，全球因战后粮食短缺，军政府便鼓励民众种植更多的粮食。这边厢，政府希望人们生产更多的粮食，但另一边则拘捕垦耕者。大部分的粮食正是他们供给的。这看似矛盾的政策成为垦耕者和官员之间的问题。但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完全没有矛盾。

非法占地及鼓励生产食品计划是两回事，前者是隶属法律问题，而后者则关系到经济问题。垦耕者反而觉得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在他们眼里，如果政府希望得到更多的食物，他们应该让人们随意种植。由于丛林里的土地是充足的，军政府根本没理由要求他们离开丛林。他们也觉得自己可以任意生产必需品。两者看似没有机会达到协商。然而，作为善意的姿态，日叻务的政府官员在某一段时期同意允许那些垦耕者每年申请许可证，租借该土地。至于那些非法占用马来保留地的垦耕者则需被驱逐，越快越好，否则马来人将会鼓噪（Laurence K.L.Siaw, 1983: 81-82）。

有限的年度许可证，被称为 Temporary Occupation Licence（临时征用土地许可证），可是在日叻务的华人心中政府所租借的土地是不足够的。只有少数幸运者受益。其他人也想拥有土地并种植农作物，因此没有放弃努力争取许可证。日复一日，人民不间断地申请临时占用许可证。与此同时，申请者或他们的亲属及朋友在丛林中进行开垦和砍伐树木、小树，清理杂草、开沟、松土，然后种植烟叶、木薯、胡椒以及其他农作物。同时又要应付政府官员的检查，私下给予“茶钱”是常事，运气不好时，农作物甚至被摧毁，导致血本无归。（林廷辉、宋婉莹，2000:67）。

最后，政府给予垦耕者六个月至两年的期限以搬离霸占的地方。宽限期结束后，他们不得不离开，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这个做法平息了大部分紧张的局面。垦耕者亦借此机会扩大生产粮食等农作物，以赚取利润。其结果是在 1947 年至 1949 期间，市场上出现了过剩的蔬菜、香蕉、菠萝、南瓜，以及其他农作物（Laurence K. L. Siaw, 1983: 82）。

共产主义的存在，很快就和垦耕者的民生问题挂钩。日叻务的垦耕者在丛林附近提供了共产党藏身之所，以逃避政府的追踪。由于此事造成政治问题，垦耕者对国家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导致政府需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来钳制他们。

二、共产主义者

在日叻务迅速恢复的英国政权几乎迫得知知港的共产党解散其新成立的“政府”。由于担心被逮捕，所有有势力的领袖及其他百余名年轻人和妇女在解散后走进邻近的丛林。在那里，他们并不孤单，只因到处可见数百个垦耕者已经遍布被遗弃的荒地处。那里的居民都欢迎任何一个进入丛林的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皆有着共同的敌人——英政府。他们中有许多人不仅是朋友，也是来自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村的同胞。共产党以不同的方式协助新加入成员——提供精神和人力支持，后者也分享了共产党提供的粮食，并接受他们的指导。许多有经验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alayan Peoples Anti- Japanese Army, MPAJA）成员乐于与这些逃犯联手组军。（J. M Gullick, 2003: 162）。他们在这儿进行军事训练，而战乱时为游击队的共产党员成了教导野战和野外求生技巧的教师。满腔热血的新移民称自己为“自由战士”，因为他们自认为曾被英政府“压迫”过（Laurence K. L. Siaw, 1983: 83）。

当共产主义活跃分子在日叻务丛林忙着进行各种“培训”和“总动员”的活动时，当地的华人人口流动保持安稳和平静。人们如常走遍各区进行日常活动和商务活动。根据 *Annual report of Jelebu for 1946 and 1947* 的显示，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然而，无论是在官员和企业界仍存不安的感觉。进出丛林边缘的青少年要么是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支持者。在知知港，他们有时甚至伴同临时参与的当地青年在街上操步以展示实力和团结。不时，现场的政府官员和警察会被狙击手射杀。由于共产党没有直接对抗或骚乱公众秩序，当局未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根据 *Annual Report of Jelebu 1947* 指出，“在政治的角度，该区全年都很安静，该国其他地区发生的骚

动并未影响到这里”。该报告接着说，在10月20日被称为左翼³¹的政党发动

“hartal³²” “导致该区多数商店关闭，剩余的商店则显半关闭状态，但‘生意照常’，观乎这些商店的店面，并无特别动态”（Jelebu District, 1947:3）。

有关“hartal”的事迹，民政事务专员曾在他的官方日记处记录，少许在该区进行或参与活动的左翼政党都会给予合理的理由。该区的商家说“他们不得不关闭商店，因为“委员会”（“hartal”）告诫他们必须遵从关闭的指示”（Jelebu District, 1947:2）。由于担心被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列入黑名单，商铺业主多数没开店做生意。

在锡矿业方面，特别是在知知港区隶属于欧洲公司的 Jelebu Tin Dredging Ltd，即使左派的思想盛行，矿工们不顾华人管工阿威（音译自 Ah Wee）以解雇的方式进行威胁，仍如常进行工作。阿威曾煽动在矿井工作的劳动者长时期罢工，那段时间已超过了经理和劳动者之前的约定（Jelebu District, 1947:2）。

尽管左派的先锋未能令日叻务总动员罢工，但职工运动的理念开始在整个地区流行开来。阿威和他的几个当地朋友（主要是煤矿工人和橡胶收割者）则继续周旋在矿业和橡胶业投资者间，挑战工会的制度。英国当局没有干预，采取了等待和观望的态

³¹ 左派，又称左翼，左派支持平等原则和平等主义，和右派相对。是指反对派之中的激进派，甚至是革命党，是和当时的政府持相反政治取向的人。广义是指不服从于当时奉行的政治体制，倾向于改变传统社会秩序的人，便会被视为左派。

³² “Hartal” 是印度文，即罢市之意，陈祯禄二次世界大战在印度时学习到的。1947年10月20日，“Hartal”的起因是战后英国欲将新加坡从马来亚半岛分割开来，以便有效地控制新加坡的军事基地，以及便于今后干预邻国的主权事务。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成员约翰·依伯（John Eber）和郭鹤龄（William Kuok）起草了《人民宪章》。它号召一个新加坡的海峡协议必须如檳城和马六甲一样划入马来亚半岛。但是，英国政府拒绝接受《人民宪章》。为此，陈祯禄号召全国人民（马来亚半岛和新加坡）进行一天总罢工和罢市。（Poh Soo Kai, 2016）

度。整个区政府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异常紧张。因面对该紧张的关系，日叻务当局增加了管理层和警察的工作量，导致他们除了维持法律和秩序外，还得监管这帮华人，管理层和警察因此陷于人手短缺。其结果是，区政府为了让息事宁人，愿意让那些没有干政的华人自行离开（Laurence K. L. Siaw, 1983: 83）。

由于共产党人的严重影响，日叻务的职工会在招募会员方面面临些许困难。由于大部分的职工会组织者来自其他城市，并不认识当地的华人，因此当地的共产党和秘密会党便乘机煽动那些欲加入工会的民众。不过，当地民众亲自接管职工会的运作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一旦接管职工会，共产党便把握这个机会，利用职工会作为掩护和招徕新兵或资金。他们还希望通过职工会举办的活动获得民众支持（Laurence K. L. Siaw, 1983: 84）。

在日叻务，五大职工会³³中的委员大部分都已加入共产党。当地许多社团的成员也加入了职工会。当宣布为合法的非政治性组织，五大职工会获得了大量的会员。基于拥有欧洲矿产，两个矿业职工会的投资者拥有几乎数千单身工人，并将他们安置在共容屋（rumah kongsi）。两个橡胶职工会（一个在瓜拉格拉旺，另一个在知知港）各自雇用大约一百个成员。在日叻务，身为共产党的一员，华人都加入了职工会或秘密会党³⁴。因此，这三个组织的运作和所举办活动都有关联的，不能分而论之。在此期间，职工会并没有向政府注册为日叻务中的一个工会。无论是秘密会党，还是共产党成员，都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政府的注册表上。因此，职工会的运作是建基于大

³³ 五大职工会包含了两个矿务工会、两个橡胶工业和一个小企业联盟（Laurence K. L. Siaw, 1983: 85）。

³⁴ 1888年前，秘密会党并不是非法组织。在1876年“海峡殖民地和各个马来亚士邦的华人口中，60%以上是秘密会党的成员，其余40%也都处在秘密会党的影响下。对华人而言，知知港的华人加入秘密会党，生命与财产才有保障。（刘崇汉，2011: 39）

家的友情和信任上。恐惧被政府当局识破身份继而迎来祸患一直是华人的特性，特别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华人（Laurence K.L.Siaw, 1983: 85）。

日本离开后（约两年左右），在日叻务的共产党员奋力拼搏，以加强准备与英国对抗。他们都避免与政府正面交锋，以防止政府增加对付他们的措施。他们也联系周边靠近雪兰莪及彭亨等地区的共产主义成员。建立新的战争时传递消息的驿站，以加强及保证成员们能在丛林里进行沟通。不久，日叻务里的共产党成员和同情该党的人都被纳入马共的游击队网络。大量的擅自占地者遍布各区，以致各区成为了游击队匿藏的理想场所，更得以避开政府军的馈送和监视（Laurence K.L.Siaw, 1983: 85）。

英国放任不管的态度促使一些共产党领导人放下芥蒂，想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几个月过去，许多生活在丛林中过着环境恶劣、艰苦生活的年轻人逐渐失去了热情。越来越多人搬回家里住，但继续参加在丛林里的营地会议和培训。他们中，有许多决定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如采矿工人、割胶工人、或散工劳动者。他们仍然坚称自己是“游击队”，并为之痴迷，同时像平时般享受生活在舒适的家里。他们仍然继续短期宿营，并高呼共产主义的口号。在遇到困难时，他们互相协助。他们虽然回归平民生活，但以另类的方式帮助共产党，如广交朋友，影响尚未涉足共产党主义的老百姓。这样的友谊和联系后来在紧急时成为了非常有用的伏兵（Laurence K.L.Siaw, 1983: 86）。

战争结束后两年，在马来亚的共产党便煽动反政府者。他们举办非公开会议，通过各种前线组织分发宣传册子和散播谣言，该组织包括职工会和文化俱乐部等。这样一来，气氛更紧张了，甚至传出共产党即将“接管”军政府的传言。英国马来亚政府最终决定对共产党采取反击的行动。

第三节 英殖民政府解决知知港难题的方式

1948年6月18日，英殖民政府宣布紧急法令，知知港被划入黑区³⁵（萧妙云，1984：31）。传令全国各地的警察局逮捕任何在该地区发现的“危险人物”。许多华人和成千上万的男性和女性（大多是年轻人）都开始担心。他们藏了起来，生怕被逮捕。

在此期间，警方在外来安全部队的协助下，在整个地区逮捕了一些被列入黑名单的共产党领袖和其支持者。当官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让政府有权搜捕任何与马共有关的人士，同时也赋予安全部队搜查住宅、搬迁居民或对怀疑资助马共的村落围以篱笆甚至焚毁。期间，英国殖民地政府军警人员还在搜查时趁机掠劫。（马华公会，1969：49-50）此举立即吓跑了那些名单上的通缉犯。1948年6月21日，一小群全副武装的警察迅间突袭几个在黑名单上的人在知知港所居住的房子。不过，黑名单上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躲了起来。（Laurence K.L.Siaw, 1983：87）。

³⁵ 共产党活跃的地方。

当紧急法令生效，马来亚政府已经意识到，遍布全国的垦耕者主要的任务是负责供养共产党游击队，甚至是招募新血。因此，在 1948 年 12 月，一个委员会被任命检查垦耕者的情况，并制定方案，以便有效的控制他们。这个委员会由五名欧洲人、三个马来人、一个华人担任。当时，“垦耕者的问题”本质上涉及到大部分华人人口。这表明即使度过了那么多艰难的时期，马来亚华人在行政方面仅扮演着一个角色，英国人则缺少站在华人的角度思考。1949 二月中旬，处理垦耕者问题的委员在两个月内完成了调查，并将报告提交给高级专员以便采取行动。该报告以一般的官腔方式强烈反映坚定的立场以解决一切行政的问题。其中五个建议是基于如何安置垦耕者入住易于监控的区域、遣返不良和不合作的民众、实施更严格的管理措施，以及通过法律手段驱逐垦耕者。在三个月内，英国陆军中将布里格斯（Lieutenant-General Sir Harold Briggs）被带到马来亚并实施该方案（Laurence K.L. Siaw, 1983: 93-94）。

同时，在日叻务，民政事务专员，豪威(C. E. Howe)，将居民分散安置在各个地区以方便监控。他指出，这种囚禁式的方案实际上在日本占据知知港郊区时已经被通过，即可让政府拥有更大的控制权，防止垦耕者自愿或受到共产党游击队的威胁而提供他们资源和避难所。其实在 1948 年初，豪威曾率先与当地警察讨论过这个想法。由于当时资金不足，再加上警察的人手短缺，缺乏能力控制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故，于是此想法没有付诸而行。尽管如此，这位民政事务专员并没有放弃他的想法。

(Laurence K.L. Siaw, 1983: 94)

纵观 1949 年，豪威每逢周六上午都会在办公室与日叻务不同地区的垦耕者的代表进行会议，要求他们与他一起讨论解决方案。这样一来，便可收到各种不同的珍贵意见。随着全国各地的总体情况并没有改善，无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开始从民政

事务专员处寻求处理基层问题的方法。1949年9月16日，在森美兰芙蓉举行了民政事务专员会议，所有在场的人都被要求提出意见，如何更快地解除紧急法令。

(Laurence K.L. Siaw, 1983: 95) 在当天的备忘录记载，豪威提出的意见如下：

日本人将铁丝网圈禁知知港和葫芦顶，派遣军队驻防这些城镇，并让所有居住在本地的华人入住保护区。尽管有人针对方案的开支或实用性和健康条件提出异议，我们就不能尝试类似这样的方法吗？如果这个方法是值得去推行，我会提出了一个更详细的方案(Jelebu District, 1948:Section 9)。

当时的政府想必已经对有朝一日能解除紧急法令抱有绝望之心，才会批准这种无形中囚禁垦耕者的建议。幸运的是，豪威运用曾与他进行会议的垦耕者给予的第一手资料，已经预先制定方案。即使强加了约束，豪威的新移民计划比垦耕者的代表所提出的建议更为实用和实际。1949年10月27日，豪威提交第一份日叻务的新移民计划的草稿给当地的政府。该计划的目标有两个：将知知港外围边缘的居民迁入所规划的小区域，以便更容易控制及减少居民在外随意活动，并避免他们在外界接触游击队员。在民政事务专员的要求下，一个会讲华文，名叫赛义德阿都拉(Tengku Syed Abdullah)的马来官员，在1949年被派往日叻务执行此特殊任务，即作为主持该地区新移民计划的负责官员。一位公共关系部的华裔地方官员 Ng Chow Hong 则被派往协助赛义德阿都拉(Laurence K.L. Siaw, 1983: 95)。

首先，官员们开始进行人口调查工作并将居民迁出。民政事务专员也发出了警告性的通告(给马来人和华人)以告知民众有关政府进行新移民政策的原因及其必要性。在日叻务推行新移民政策的特务小组奉命先从知知港区着手。1949年12月5日，

赛义德阿都拉到达后，连忙和 Ng Chow Hong 连同几个助手赶去知知港。他们的特务小组由当时刚成立的马来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的秘书兼主持人的萧炳娇接待。知知港的马华公会在 1949 年 5 月 30 日成立。同一年的 6 月 26 日，瓜拉格拉旺也成立了马华公会分会。马华公会成立当天参与者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留下与政府合作，看顾当地的华裔居民的福利。在日叻务，很少有人真的热衷于加入马华公会，因为惧怕共产党报复。在知知港，不到二十人加入马华公会，但是为了顾全民政事务专员和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面子，一组最有影响力的商人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就在此时，一些共产党员甚至到了马华公会成员常去的聚集地，警告他们停止协助政府处理任何方案，否则将会对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产生威胁（Laurence K.L.Siaw, 1983: 97）。

在 1949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五），赛义德阿都拉的正式日记里记载：“令人惊讶的发现就是萧炳娇先生（知知港马华公会的秘书）已改变先前的态度，他告诉小组成员，他不希望任何垦耕者看到任何官员出现在他的房子里，这是违背了先前的协议。”（Jelevu District, 1949:1）其他该区马华公会的成员都因“紧急事务”而呆在芙蓉或其他地方。当特务小组的成员去面见友人或与他们对话时，小组成员仅得到简短的回复或发现友人突然离开的消息。最后，特务小组不得不在当地警察的协助下与民众答辩，然后进行调查及记载一切事务。他们甚至不得不将自己的办公室搬到警察局一段时间以免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威胁（Laurence K.L.Siaw, 1983: 97）。

尽管遭受冷待和经历恐吓，特务小组继续在知知港进行调查和人口普查的工作。1950 年 1 月 7 日的一个晚上，就像计划中一般在 Kenaboi（又名简塘尾，靠近知知港）进行深入的普查，Kenaboi 的村长和另外两个马来人在同一个甘榜处被共产党游击

队杀害。“该区进行任务的重装安全部队，证实了敌人的强势实力，敌人曾是该地区的真正管治者，敌人更得到了完善的供给品和支持。”（Jelebu District, 1957）政府军队奉命立即将原本混居的马来人和华人安置好。马来人都被分配到 Kampong Poom，而华人则在知知港。对此，居住在日叻务的居民都产生了浓烈的猜疑、仇恨和不信任之心。由于共产党给予执行新移民政策的特务小组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务小组必须增加更多的人手和较好的服务人员来处理垦耕者的问题。1950年2月中旬，一位经验丰富的华人事务官员，A. W. Lacey（莱西），接手执行区内一切有关重新安置华人的任务，而民政事务专员则集中在处理马来人的住所问题（Laurence K. L. Siaw, 1983: 97-98）。

莱西非常同情垦耕者，在小区内进行环境审查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某种形式的经济补偿，应给予那些被要求离开自己的家园并被重新安置住所的人。他认为，在1950年时定下 M \$39,600.00³⁶作为安置费用是不够的。莱西甚至发现，许多垦耕者不如所预期般得到恰当的安置。他估计，超过六百多家庭将不得不搬进所规定的住处，因此至少得支付他们 M \$120,000.00 以作补偿。（Laurence K. L. Siaw, 1983: 99）鉴于事态的严重性，这笔钱将按照以下方式支付予垦耕者：

³⁶ 1990年，马来西亚政府规定，马来西亚货币的符号为“RM”，取代之前的“M\$”。

表（二）：搬迁赔偿表

1	在限期内毁掉旧屋	M \$ 50.00
2	在新村内重建新屋	M \$ 50.00
3	行为好者获 2 次生活津贴（每月 40.00 马元）	M \$ 80.00
4	新村便利（及其他）	M \$ 20.00
		总 M \$200.00

（林廷辉、宋婉莹，2000：11；Laurence K.L.Siaw, 1983：99）

为了不浪费时间，莱西在知知港提高实施新移民政策的速度和效率。正规英军部队以及警察都被召来协助。从 1950 年一月中旬至 3 月底，在知知港周边地区的垦耕者被疏散到知知港东南端的 Kimloong 和 Hosapa 区。许多军用卡车和警察吉普车都被征用来运送垦耕者和他们的财物。据说，涉及帮忙搬迁的士兵和警察极为粗蛮。在另一方面，官员报告说，迁徙工作通过务实和有纪律的监管下迅速地进行着（Laurence K.L.Siaw, 1983：99）。整个运作过程进行得非常严格，垦耕者必须遵守所有为他们而设的安排，如什么时候该准备好、须付多少收拾费、在哪里集会，以及遵守任何随时改变的计划。对于这一连串的安排，大家都感到很恼火，但特务小组无意理会，反而在他们遇到困难时仍不停施压（Laurence K.L.Siaw, 1983：99-100）。幸运的是，暴动与抵抗的情况并未发生。虽然曾发生少数静坐示威事件，他们都被强行驱散。作为惩罚，他们的房屋皆被摧毁。没有共产党游击队亮相阻碍军队和警察进行工作。其结果是知知港区的新移民政策顺利完成，很少发生暴力或动乱事件（Laurence K.L.Siaw, 1983：100）。

在实行新移民政策前，知知港的人口大约有 3000 人，约 500 户。人口下降是由于恢复英国统治后涌现了一系列迁移他方的潮流。那些选择离开的人主要是年轻人，他们曾在战后参与共产主义活动，并且曾被英国当局逮捕以致吓得逃跑。紧急状况宣布之后，当局以安全为由，将数百个擅自占地者搬到知知港 - Mahfong 区（擅自占地者自己选择的地区）。据报道，当迁徙计划正在实施，两千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垦耕者）在没有得到政府的资助与劝说下，自愿迁入知知港。这些人不想让共产党认为他们与当局或共产党主义者有任何合作关系。他们也害怕对抗政府官员，因为担心被逮捕或名字被注入黑名单。因此，根据记录，79 户家庭中有 339 人在迁徙中是接受政府的资助和援助的（Laurence K. L. Siaw, 1983: 100-101）。³⁷

1952 年至 1957 年，整个简塘尾里的住所被称为“无人区域”，因为所有的华人都迁到甘榜 Chennah(又称真纳)居住。那里曾经保留给马来人作为安身之所，这里的华人尔后被迁移到知知港。在紧急状态期间，除了被新栅栏包围的 Sungei Mutoh（知知港以北三英里外）和知知港这两个“乡村”，自知知港到甘榜 Chennah 没有一个单一的建筑物。栅栏区外所有的房屋皆被拆除或烧毁。政府协助许多户人家搬入知知港的 Hosapa 区和知知港的 Kimloong 区。1955 年，知知港新村（包括知知港镇、知知港的 Mahfong 区、知知港的 Hosapa 区和知知港的 Kimloong 区）的人口大约有 5,500 人（502 户）（Laurence K. L. Siaw, 1983: 101）。

在审议迁徙的影响前，最重要的莫过于事先了解或估计华裔居民对重新被安置新居所时会作出的行为和反应。尽管在知知港区已经有各种方言群体（以福建话、广东话和海南为主）的存在，然而在 1950 年的主要人口还是惠州客家人，因为自萧官姐时

³⁷ 受访者：萧妙云，2012 年 6 月 3 日，萧妙云住家。

期起，惠州客家人实际上已经遍布整个知知港。在中国，这些客家人原本是以耕作为生。他们以种植水稻和蔬菜为主要职务（Laurence K.L.Siaw, 1983: 101、102），可是中国东南沿海省份因为山多田少，自然灾害频繁等自然因素，以及人口膨胀，导致人地比例失衡，加上英国在马来亚需求劳动力，造成清末人口外移（陈砚棻，2010: 15）。第一次国共内战³⁸后，广东客家住地的各级党组织（共产党）遭受破坏，地下党员在失去联络的情况下，纷纷避居东南亚各国（罗英祥，1994: 5）。

刻苦耐劳成为惠州客家人的标志，这种特征更在海外延续，尤其在日叻务。曾经与他们交涉过的官员显然赞同以上对客家人的观点。豪威（民政事务专员）得出的结论是：“那些辛劳采矿的华裔居民从不服从任何形式纪律”（Jelebu District, 1948:3）。赛义德阿都拉在他的官方的日记记录道：“惠州客家人（在知知港区）普遍上都像一粒难以被拨开的硬坚果”（Jelebu District, 1949）。莱西（负责华裔事务的官员）完成了赛义德阿都拉所委派的任务，从中得知“惠州客家人是个既坚强又独立的群体，已经习惯于应付各种苛刻的环境，这些都是令人钦佩的特点。他们也是固执的人，除了自己之外，不会接受他人的意见去改变原有的计划”（Jelebu District, 1950）。莱西进一步补充说：

日本占领军发现在屠杀大约 2000 位知知港的居民后，丝毫未减客家人的固执特征，顿觉知知港客家人是个绊脚石。Spencer Chapman 曾在他的著作 *The Jungle is Neutral* 里提到那次的大屠杀使知知港区和 Pertang 区的居民更加倾向于 MPAJA。在日叻务，日军投降撤离和英军重新掌权期间的三个星期内的无政府状态，马来亚共产党在当地成为最高统治者，非常强势（Jelebu District, 1950）。

³⁸ 第一次国共内战是指中国在 1927 年至 1937 年间，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性政权之间的战争。

根据大众给予知知港华裔居民的说法，曾经与该区华裔打交道的政府官员往往都以恶劣的方式对待他们。在知知港的资深居民声称，“这些当兵的欧洲人和他们麾下的马来警察”（Laurence K.L.Siaw, 1983: 101、102）在进行迁徙计划时，都以“非常残酷”的方式对待他们。他们声称，他们当时就“像只动物般被驱使”，甚至被一些认为民众不给予合作而“非常生气”的士兵“踢”。尽管民政事务专员在官方会议中不断重申，在进行新移民政策时，以人道主义的方式对待那些垦耕者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以尽量减少反政府情绪，然而许多受牵连的民众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在奉命后必需在短期内搬迁，而他们的财产和农作物将在离开后被摧毁。根据官方记录，那些在知知港区的垦耕者接受政府所提供的财政援助后，似乎很少人是真正得到政府的实际帮助。（Laurence K.L.Siaw, 1983: 101、102）

根据在‘*Statistics of Chinese Settled under E. R. 17(F) in Jejebu*’里的附录‘*Closer Settlement Report, Jejebu*’（日叻务新移民政策的详尽报告书），79个家庭曾经登记并得到政府的援助。在这79户家庭中，仅有21户是在莱西的赔偿计划下真正得到高达M \$140的赔偿金的住户。其他的36户家庭各自获得M \$90，剩下的22户家庭则一无所获。

由于有些垦耕者早就在知知港区建立良好的人缘关系，这使他们迁徙到知知港时没遇到任何难题。除了以上的幸运儿，剩余的家庭在知知港进行迁徙计划时都得面对极大的困境。鉴于英殖民政府以武装警队强迫避迁，居民虽然得到英政府提供运输工具以帮忙迁移，但是当垦耕者不给予合作，军警便强行拆屋，强硬拉人搬迁（林廷辉、宋婉莹，2000: 11）。

那些被官员所安置并居住在环绕荆棘篱笆的居民，给人的印象就是那里的居民正是囚犯。他们不习惯被困在这儿，久而久之对政府的意图产生怀疑。一些人和家庭就因此离开知知港，然后迁进芙蓉或其它无需居住在围栏里的城镇。虽然大部分居民对政府产生怀疑，也不信任政府，但他们都愿意留在那儿。由于政府官员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依然疏远，他们极少合作完成一件事。他们每一方都怀疑对方的动机。鉴于政府限制居民进出围栏，因此影响大多数生活在知知港的居民，尤其是那些需在围栏外工作的人。大部分在外围工作的人都是以收割胶和采锡矿或洗涤筛盘为生。这是其中一个在当局进行新移民政策后面临的重大问题。官府不得不放宽禁令，以及减少在食品和药品方面的限制，以便“新村民”能如常地维持生计。（Laurence K. L. Siaw, 1983: 102、103）其结果是，官府实施粮食统制，村里两端设立关卡。每天早晨六时，官方开放让村民出城工作，同时必须经过检查，任何工作人士不准携带粮食及药品，只许携带个人食品及饮料，下午六时之前必须回返新村，若有违反，均格杀不论。（萧妙云，2011: 31）在1950年8月22日，根据日叻务民政事务专员给予A. N. Ross（雪兰莪英国代理顾问）的回条中，他们感叹地说：“. 我们获得消息，食物已经流出围栏外”（Jehebu District, 1949）。 *Appreciation of CT Reaction to Food Control in Titi* 也曾提到：（由于游击队）得到民众的同情，他们常将米饭、木薯、马铃薯、榴梿、香蕉等食物送给游击队（Jehebu District, 1950）。

在全马来亚实施拆迁与重新安置垦耕者（主要在农村地区的居民）的计划下，有超过一百万人受到，大约是当时马来亚七分之一的总人口。这些重组包括了42%的印度人、38%的华人，及16%的马来人 - 总计65万人。其中77,000人当中的78.5%的人集结在橡胶园地区，12.3%的人集结在采矿区，而9.2%的人则集结在其他集中地。剩余的573,000人中，86%是华人，9%是马来人，4%是印度人，剩下1%是其他种

族皆被重新安置在 480 个“新村”。（林廷辉、宋婉莹，2000：28；Laurence K.L.Siaw, 1983：103、104）

这个安排严重地影响了市场在几年内供应本地生产的水果和其他农作物。至此，那些曾经随处寻找适合的土地种植农作物的垦耕者已失去了自由。安全部队和警察现场人员不断在农村进行肃清，并摧毁一切可能在培育共产党游击队的耕种地。因此，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相反的，外国进口货则开始大受欢迎。幸运的是，50 年代朝鲜战争和东亚其他地区的动乱，因美国的介入而令亚洲业务崛起，增加了锡和橡胶的庞大需求，其价格更因此攀高，而马来亚正是生产此两物的盛产地。此等状况增加了收入水平，并抵消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的压力。其结果是，马来亚民众在迁徙计划后，虽然生活成本突然高涨，但民众仍完全不受到影响（Laurence K.L.Siaw, 1983：104）。然而，鉴于紧急法令以及全马来亚新村移民政策实施的后遗症，英国人丹门（Dunman³⁹）在日叻务组织的铁船公司，在 1953 年停办。丹门的停办，锡矿失去了运输的交通，也失去了买家，导致许多劳工失去就业机会（萧妙云，1984：31）。

至于社会文化方面，这种以集中式的方式强迫群众生活在围栏内，并将某个乡村定名为“新村”，更明显地隔离不同种族。新村的成立令方言群的聚落固定下，也使客家聚落更明显地发展起来，甚至将这些客家聚落继续保持本身的特色。（张晓威、吴佩珊，2011：145）

³⁹ 原名 W. Dunman，在日叻务被授权经营 1,000 英亩的咖啡种植地。他在新加坡时是个出名的板球运动员、赛车手和业余演员。经过家人的劝说，他拿了家人的资助金，决定在 Sungai Ujong 经营 Terentang 和 Gadut estates。（J.M Gullick, 2003：85）。

紧急法令实施后，上午 6 时才让有通行证者外出，傍晚 6 时就会关门。所有外出的人都得先接受严格检查，所携带的粮食不能过多。他们每天都得提心吊胆地面对审查，有者甚至挨饿（周厚荣，2010：159）。此外，民众不能自由进出，活动范围不大，拥挤的环境增加他们间的利益冲突，令大家的关系紧张。拥挤的居住条件造成居民缺乏隐私，以致增加了挑衅事件和闲言广传。其结果是在迁徙后的最初几年，常见家庭人员的争吵声。后来，人们渐渐地适应了新环境。至于那些年轻人则更侧重于实际又不拥挤的居住方式，开始不会对邻居们的行为感到反感。村民们间的人际关系开始改变和复杂主要体现在社会行为方面。此外，成长中的儿童与家长都陷入争执中，因为长者们都主张在教育孩子时需强调传统的道德观和有礼的行为。拥挤的环境加剧了当时的紧张局势。（Laurence K.L.Siaw, 1983: 105-107）⁴⁰

虽然刚开始那几年人与人经常发生冲突，但是过后逐渐减少发生严重的冲突和发生事故的频率，此后人民为了适应在‘新村’的生活，知知港的村民往往仅懂得自扫门前雪，以及只愿与那些远离家乡的人交往。此外，英殖民政府并未为新村居民提供足够的农耕地，一些地点不适合农耕用途，‘新村’也大多数没有供给将来发展的空地（林廷辉、宋婉莹，2000：22）。一直到 1957 年，马来亚联合邦获得独立，知知港民众方能脱离“篱笆”这种类似监牢式的生活。

⁴⁰ 受访者：周厚荣，2011 年 12 月 3 日，强中贸易

第五章 结论

知知港，一个经历风霜的村落，在马来西亚独立后逐渐备受外界关注。被关注的原因大都源于那地方曾经在日据时期发生大屠杀事件。不过，除此之外，知知港仍存在着许多历史轨迹，值得记载。

图 6：知知港余朗朗蒙难同胞纪念碑



拍照日期：2014年2月16日

1976年10月21日，知知港各华团联合成立筹建日治时期知知港余朗朗蒙难同胞纪念碑（陈松青，1988：28）。该碑已成为知知港游客必到的观光地。当年从日军刀口上逃出生天的幸存者，即萧月娇、萧云、萧月、周根、萧送、萧招娣等人皆曾接受访问道出当时的苦况。如今仍留待该村的幸存者仅剩萧招娣一人。因此，她经常接受报章与学者的访谈，更是知知港家喻户晓的人物。

此外，报章上也不时刊登幸存者如何高呼冤屈与索偿的问题。据《新明日报》在1992年10月12日，针对马新要求日本政府为其曾屠杀民众的课题上作出赔偿的报导，“这项要求是理直气壮的，因为经日军蹂躏过的国家在战争结束后均有受到赔偿，唯有马新两地，未获分文赔偿”（刘吉彬，1992：5）。正因日政府当年否认史实的态度，致使幸存者的愤怒，更派出一名代表，孙建成为民请命。1993年8月，日政府终于答应赔偿幸存者家属（佚名，1993：3）。

也许是报章或书籍不停渲染日军在知知港曾犯的恶行之故，大众开始关注该地域。

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大公司裁员减薪，失业人数逐渐增加。正巧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知知港内的天然资源，如锡矿已开采完毕，村民只能依靠土产如凤梨、香蕉、甘蔗等农作物为生，有者为了生活而经营熟食店、餐馆等。无论是耕种，抑或看顾店铺都是一份苦差，加上薪水不多，以致许多年轻人萌生向外发展的念头（周厚荣，2010：168）。2003年，萧妙云为了让知知港的历史背景传承下去，成立了史料协会并担任主席（厚荣，2010：119）。

闻名全马的凤梨正是知知港农民主要收入的副业。其品种加上优良泥土土质和肥料是栽种凤梨的最大本钱。由于播种凤梨到开花结果的时间要一年多，而且雨水和阳光都要充足，加上知知港缺乏耕种土地，如果丰收，又怕没价，失收就连本带利两相亏，造成梨农越来越少。当地的榴槤知名度也很高，特别是猫山王和 D24 品种，它的肉味、颜色、味道柔滑、香甜甘美、价钱又公道，经常吸引游客前来选购（周厚荣，2010：210A）。

2014 年，真纳区州议员陆兆福请人在知知港处绘出五幅壁画，又命人印制小册子介绍当地的旅游景点和美食以吸引游客前来。知知港更因此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据当地的居民描述，自从有了小册子和壁画，假日时，总是有许多游客前来拍照留念，有者甚至为了品尝知知港的美食不惜劳苦多次前来。然而，自从知知港成为著名的旅游区后，物价逐渐调涨。若此风不竭，将会吓跑有意参观此区的游客。

纵观许多有关知知港的史书，大多宣扬萧官姐创建的功劳，只有少部分有记载其他开埠先贤的贡献，这应该是除英政府外，萧官姐是唯一能解决华人难题的华人领袖。其余的开埠先贤，如叶房、陈天财等只是在那地方的其中一个商家，并无萧官姐的魄力与能耐号召华裔同胞。

知知港由一个无人知晓的村庄蜕变成知名的旅游胜地，过程中，经历了许多风雨。它被外界发掘，源于它的得天独厚，怀有锡矿；它被遗弃，因失去了怀中宝——锡矿。

英殖民时期和日据时期的历史似乎被年轻一代遗忘。他们知道马来亚曾被英国和日本统治，但不了解在两者统治下面临过的一切。原先，在英政府的统治下，华人的生活相对相安无事。然而，民智渐开，加上祖国（中国）的政治因素，知知港华人的心思竟由此改变，英政府亦如是。到了日军侵入，华人更是备受打压和倍受猜忌。加上日军暗地里挑拨马来人与华人的矛盾，让马来人充当当地向导残害华人，以致他们互相仇视。在无助的情况下，华人只好暗地里崛起反抗。

日军败退后，知知港华人又陷入了另一难处——不知该协助共产党还是英政府。大部分的民众最终选择了安宁的生活，虽然心中不愿，但至少活得平和。

马来亚独立后，人民虽然得到了自由，可是有些人的灵魂仍在煎熬着。他们就是知知港余朗朗大屠杀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他们曾经向政府申诉，曾经要求日本公开道歉，甚至赔款。然而，在日本军国主义在占领我国时，“对华人加大棒，对马来人给胡萝卜”（陆培春，2014：224），马来人和印度人反而受害甚少，战后的政府又需要借助日本的经济援助，因此不愿提起大屠杀事件以免影响两国邦交。华人只能自己做记录，完全不能仰仗政府的援助。

虽然国家不愿为受害者争取赔偿，但是人性本善，不少当年参与屠杀的加害者陆续地站出来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及向所有受害者致歉。其中一名当年在森美兰有着直接关系的步兵十一连，第二大队之士兵在“太平洋战争牺牲者，将他们铭刻于心会”的追悼会上，将手写的信转给森美兰的出席代表。他承认自己是一名杀人者，他忏悔，在心里深藏着黑暗的过去，感激森州文人到日本，但无颜见大家，只要求森州

有关人士原谅他（佚名，1988：4）。可见心之不安、良心斥责比表面上的赔偿更有效整治犯罪者。

知知港华人的心态变异皆系于政治的更动，两者均不能分别论之。若非中国当时与英国陷入僵硬的关系，知知港的华人不会因爱国心切而对英国产生猜忌之心；若非日军侵略马来亚，残害民众，当地华人不会升起谋反之心；若非共产党的因素，英政府不会实施紧急法令。执政者的态度直接影响民生，战乱更是致使一个区域的衰败。

如今的知知港携持着浓厚的历史色彩。虽不能再次令其成为华人的集中地或吸引土生土长的人才回流，但是对它的历史回忆会再次被掀起，无人能否认华人曾在知知港的付出与贡献。

参考书目

1. 陈嵩杰（2003），《森美兰州华人史话》，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
2. 陈松青（1988），《日治时期森州华族蒙难史料》，森美兰：[马来西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出版。
3. 陈砚棻（2010），《战后马来亚华人公民权与权益之发展（1946-1957）》，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研究部硕士论文。
4. 邓力群（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北京：当年古代中国出版社。
5. 林博史（1989），〈日军南侵统治，森美兰肃清惊惶〉《新明日报》。
6. 林廷辉、宋婉莹（2000），《马来西亚华人新村 50 年》，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7. 刘崇汉（1984），〈知知港客家村历史沧桑〉《森美兰知知港群英国国民型华文小学七十三周年纪念特刊》，日叻务：群英校友。
8. 刘吉彬（1992 年 10 月 12），〈日马新人民未得分文，索偿符合公里道义〉《新明日报》
9. 刘竹风主编（2000），《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中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0. 罗英祥（1994），《飘洋过海的客家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1. 陆培春（2011），《马日恩怨录》，吉隆坡：陆培春留日中心。
12. 陆培春（2014），〈惨绝人寰的 3 年零 8 个月〉《马来西亚的“日本时代”》，吉隆坡：雪隆中华大会堂。
13. 马华公会（1969），《马华公会 20 周年特刊》，吉隆坡：马华公会总部。
14. 莫顺生（2000），《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吉隆坡：东方企业。
15. 单汝洪（1999），《森美蘭抗日游擊戰爭回憶錄》，香港：南島出版社。

16. 司马乔（1992），《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香港：香港见证出版公司。
17. 王赓武（1994），《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18. 王曾才（1991），《世界现代史（上）》，台北：三民书局。
19. 王曾才（1992），《世界现代史（下）》，台北：三民书局。
20. 翁清玉主编（1988），《日治时期森州华族蒙难史料》，森美兰：森美兰大会堂出版。
21. 我是知知港人（年月不详），《知知港，我们的家》，
<https://www.facebook.com/52titi/info>
22. 萧妙云（1984），〈知知港今昔谈〉《森美兰知知港群英国国民型花纹小学七十三周年纪念特刊》，知知港：群英校友会。
23. 新马侨友会（1992），《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香港：香港见证出版公司。
24. 徐俊华（2016），《霹雳州锡矿业没落对怡保华人社会发展之影响（1985-2016）》，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学士论文。
25. 叶金英（2011），《知知港群英华小百年校庆纪念特刊》，森美兰：知知港群英华小。
26. 佚名（1993年8月20日），〈日允赔偿蒙难者家属，堂联插手邀功〉《新明日报》。
27. 佚名（1988年8月25日），〈我是杀人者！〉《星洲日报》。
28. 张晓威、吴佩珊（2011）〈马来西亚客家聚落的产业经济发展：以沙登新村为例〉，收录于萧新煌，《东南亚客家的变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页143-178。
29. 赵荣、王恩涌、张小林（2006），《人文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30. 钟松发、黎煜才（2013），*Kamus Perdana*，雪兰莪：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
31. 周策纵（2000），《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
32. 周厚荣（2010），《知知港开埠史料回忆录》，日叻务：强中贸易。
33. 周厚荣（2014年7月14日），〈知知港开埠先贤·萧官姐照片曝光〉《星洲日报》。
34. 周厚荣（2015年4月20日），〈叶房是知知港开埠功臣？叶家子孙口述丰富史料搜集〉《星洲日报》。
35. 周厚荣（2015年5月5日）：〈追溯至1838年？·知知港开埠史待考究〉《星洲日报》。
36.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Taburan Penduduk Mengikut Kawas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dan Mukim 2010*
37. Jelevu District (1947), Annual Report of Jelevu for 1947
38. Jelevu District (1947), Diary of Jelevu for 1947, No. 23
39. Jelevu District (1948), Annual Report of Jelevu for 1948
40. Jelevu District (1948), Document of Jelevu 6/Secret/48, Section 9
41. Jelevu District (1949), Document Of Jelevu, Conf. 8/49, No. 82
42. Jelevu District (1949), EJ 4/49, No. 37 (Secret)
43. Jelevu District (1950), Memorandum dated October 1950 re
‘Resettlement of Rural Chinese in Jelevu District, N.S.’
44. Jelevu District (1956), Annual Report of Jelevu for 1956
45. Jelevu District (1957), General Report by District Officer Jelevu’
in Closer Settlement Report, Jelevu

46. J. M. Gullick (2003) , *A History of Negeri Sembilan*, Kuala Lumpur: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7. Laurence K.L.Siaw (1983) , *Chinese Society In Rural Malaysia : A Lo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iti, Jelebu*,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8. Masriah binti Mispari (2014) , *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Sejarah Tingkatan 2*,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49. Norazit Selat(1990), *Negeri Sembilan Dahulu dan Sekarang*, Kuala Lumpur: United Selangor Press Sdn Bhd.
50. Poh Soo Kai (2016) , *Speech at SOAS on May 10*, <http://www.nandazhan.com/mail/mail356.htm>
51. Ramlah binti Adam (2014) , *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Sejarah Tingkatan 3*,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52. SANDHU, Kernial Singh 1964a. “Emergency resettlement in Malaya” , *Th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 18: 157-183.
53. Siow Kong Choon, Chin Ka Chin (2010) , *Utar New Village Community Project Report*
54. Spencer Chapman (2003) , *The Jungle is Neutral*, Guilford : Lyons Press
55. State Negeri Sembilan (1957) , *Population Census No. 7*
56. State Negeri Sembilan (1970) , *Population Census No. 7*

附录

受访者名单：

序	受访者	日期	地点
1	周厚荣 (知知港文史工作者)	2017年3月18日、2011年 11月11日、2017年3月28 日	强中贸易 (知知港)
2	萧妙云 (知知港史料馆协会会长)	2012年6月3日	萧妙云住家 (Taman Titi)
3	叶玟豪 (马来西亚海陆会馆署理会 长)	2017年3月28日	强中贸易 (知知港)

2010年日叻务的人口数目：

2010年日叻务的人口数目					
	巫裔	华裔	印裔	其他	总数
榴梿知贝	36	111	12	-	159
半芭新村	3	234	35	-	273
真纳	382	158	-	-	546
瓜拉克拉旺	402	441	61	-	911

葫芦顶	139	527	17	-	684
古打新村	369	623	13	-	1, 009
新邦榴梿	504	3	7	20	535
新邦葫芦顶	261	567	129	-	957
双溪毛糯	481	-	-	-	481
双溪文都	-	384	4	3	392
知知港	34	1, 709	32	7	1, 800

上表资料取自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2010:67)。

知知港历年大事年表：

年份	知知港大事
1838	知知港开埠
1872	拿督格兰纳继任为芙蓉双溪乌绒的首长
1874	拿督格兰纳与英方签署协议，让英方拥有在双溪乌绒的开采权
1893	位于知知港的欧洲采矿公司停止营业
1942	日本占据马来亚，粮食短缺
1945	日本无条件投降

	共产主义者在日本投降后进驻知知港
	英政府在十月份献议共产主义者投降并控制知知港
1948	知知港被划入“黑区”
1949	赛义德阿杜拉成为新移民计划的负责人
	马华分会成立
1950	知知港周边的垦耕者倍疏散到 Kimloong 和 Hosapa
1952	华人被迁至 Chennah 居住
1957	马来西亚独立
1958	劳工党成立支部
1959	慈仁堂黄老仙师建庙
1962	萧氏联宗会成立理事会
1963	河沙坝兴建篮球场
1965	知知港第一间幼稚园成立
1967	政府兴建第一期平民屋，五十间于河沙坝区
1968	知知港诊疗所开幕
1970	火烧坪兴建警察局
1971	河沙坝发生大水灾，木桥被冲坏，水入屋四尺深
1973	群英校友会成立

1974	日叻务篮球分会正式成立
1975	马华公会成立会员子女奖励金 马房巷三间房屋烧毁
1976	青团运（GBB）成立支会 政府成立睦邻计划 知知港各华团联合成立筹建日治时期知知港余朗朗蒙难同胞纪念碑
1978	政府成立自卫团 曾永森拨款兴建民众会堂
1979	乡团热烈建立余郎郎纪念碑 政府建成第二期贫民五十间
1980	地方议会结束 县议会成立 余郎郎路口地段发展，马华镇诞生
1981	新警察局开幕
1982	青团运成立支会（YMM）
1983	东诚信贷有限公司开张
1984	金山合作社，惠联合作社，开张营业
1986	群英学校鸿妹堂开幕

1988	<p>八月三号政府冻结全马华资合作社，金融公司关闭</p> <p>群英学校四楼综合中心开幕</p> <p>土著联昌银行开张营业</p>
1989	民政大厦兴建
1990	群英四大机构主办南洋商报十大义演
1993	伟发堂、水旺堂、陈梦堂、月梅堂，开幕启用
1996	<p>河沙坝新村成立治安发展委员会</p> <p>经济不景，大公司裁员减薪</p>
1999	乐龄休闲俱乐部成立
2000	<p>中国鹤翔庄气功成立辅导站，日叻务慈善俱乐部成立</p> <p>马华镇民众会堂建成启用</p>
2002	十二月一号，新加坡梁智强在知知港大街拍电影《跑吧！小孩》
2003	成立了史料协会
2005	马华镇睦邻计划会所及幼儿园启用
2007	<p>七月十一号，萧氏联宗会新大厦落成开幕，中国深圳坪地恳亲团二</p> <p>是为高级长官及国内外宗亲代表到访</p>

整理自周厚荣的《知知港开埠史料回忆录》（2010：212-213）

